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鸦片战争故事

 **eBOOK**
网络资料 非卖品

序

何东昌

一个民族要振兴，就要在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基础上团结凝聚起来。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历史和百多年的反帝爱国斗争的历史中形成了爱国主义传统。在面临国内外敌对势力图谋对我国实行和平演变的今天，让青少年懂得历史特别是百多年来中国人民饱受屈辱和进行英勇抗击并取得胜利的史实，让他们从自己祖国的历史发展中寻找未来正确的走向，无疑具有极大的重要性。我们希望在各方面的支持下，我国中小学的爱国主义教育在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以后能够真正有效地加强起来。正因如此，值此鸦片战争 150 周年之际，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编辑了这套丛书，愿它能对大家有所裨益。

1990.3.14

鸦片战争的故事

罪恶的“贸易”

清朝道光年间（这里主要是指公元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广州珠江出海处的洋面上，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

每当几艘满载着鸦片的外国商船停泊在伶仃洋（也可写为零丁洋）的时候，总是有一溜小船飞快地向大船驶去。大船上的人们一等小船靠近，忙着把一箱一箱的鸦片卸下来，装上小船。装满后，小船张起船帆，伸出船桨，由外国商人押着划向虎门。

虎门是广州的门户，那里来回行驶着许多清朝水师缉查鸦片走私的巡逻艇，艇上都有武官和士兵。小船开到巡逻艇旁边，船上的外国商人立即向巡逻艇上的武官扔去一个沉甸甸的红布小包。武官熟练地伸手接住，掂掂分量，装进了口袋，然后挥手吆喊一声“上船检查”，带领几个士兵走上小船，装模作样地检查一番。他们脚下踩着鸦片箱子，眼前堆着装满鸦片的蒲包，嘴里却说：“没有鸦片，走吧！”便放小船驶向广州去了。

有的时候，还可以看到装满鸦片的走私船插着“粤海关”的旗号，神气十足地直接开向广州，水师巡逻艇的武官根本不敢过问。他们知道，那些商人已经花钱贿赂了他们的上司。上司允许人家打出自己的旗号，下级也就装着没看见，随它通行无阻地行驶了。

这些就是当时鸦片走私“贸易”的真实情景。那些外国商船主要是来自英国，还有美国和法国。

十八世纪后半叶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英国正处于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通过工业革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英国殖民者一方面进行海盗式的侵略活动，驾驶着武装齐备的船只到处杀人抢劫，贩卖奴隶；另一方面又寻求扩大推销工业产品和掠夺原料的市场。他们在亚洲强占印度以后，就把侵略的矛头指向地大物博的中国。

中国当时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清王朝一直采取限制对外贸易的政策，规定除广州以外，不许外国船只到其他沿海口岸进行贸易。英国及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偷偷摸摸地进行着各种非法活动，但是还远远不能达到他们向中国倾销工业产品而牟取暴利的目的。于是，谋财害命的鸦片烟，就成为它们向中国输出的拳头“商品”。

鸦片又叫“阿芙蓉”、“大烟”或“烟土”，是用罂粟果实中乳状汁液制成的一种有强烈麻醉性的毒品。少量服用，有镇痛、止泻、止咳作用，可一经吸食，极容易上瘾，每天就离不开它了。慢慢地，人变得面黄肌瘦，萎靡不振，成了“大烟鬼”。英国占领印度以后，强迫当地人民大量种植罂粟，制成鸦片，再由英国的殖民机构东印度公司集中起来，用大船运到中国倾销。清朝政府虽然多次颁布过禁止贩运和吸食鸦片的命令，但是由于政治腐败无能，不少官员依赖鸦片来消磨荒淫无聊的寄生生活，也有很多官吏接受内外烟贩的大量贿赂，从中牟利包庇，使鸦片走私活动越来越猖獗。鸦片走私的主要口岸广州，上自总督，巡抚，下至差役、兵丁，包括负责对外贸易和缉私的粤海关监督，大多和烟贩沆瀣一气。这就出现了前面提到的走私鸦片的船只插着两广总督或粤海关监督的旗号，威风凛凛地驶进广州的情况。北京的朝廷贵族大臣，也因为从广州等地官吏那里收到大量贿赂，视而不见。清朝的禁令成为一纸空文。英国殖民者用鸦片毒害中国人的目的已经“初见成效”。

嘉庆五年（公元 1800 年），鸦片输入还只有四千五百多箱，以后逐年猛增，到了道光十八年（公元 1838 年），就增加到四万多箱了。清朝每年出口的大量茶叶、丝绸等土特产，还不够抵偿鸦片的价值。据道光十五年（公元 1835 年）的估计，当时中国已经有二百万人吸食鸦片，每年白银外流四百二十万两。鸦片既害了中国人，又给清朝的财政造成了很大损失。当时，人们把鸦片走私商人查顿等叫做“铁头老鼠”，就维妙维肖地刻画了这些外国奸商的丑恶嘴脸。

但是，象“老鼠”那样进行走私活动，只能开掘一个钻进中国的窟窿，而不能打开中国的大门，进行明火执仗的大肆掠夺。英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早已感到不满足，为了扩大超额利润和财政收入，开始策划挑起战争的阴谋，要用炮舰来轰击中国的大门了。

道光十二年（公元 1832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让公司的广东商馆职员林赛改名胡夏米，冒充“阿美士德”号船的船主，又派德国“传教士”郭士立当他的助手。郭士立是东印度公司的翻译兼医生，又是进行鸦片走私活动的“老岸商”，会说广东话和福建话。他们纠集了七八十人，驾驶着“阿美士德”号船从澳门出发，在南澳岛、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和威海卫等地进行活动。每到一处，胡夏米就摇晃着“通商”的旗号，向当地清朝官吏递上一份“说帖”，要求进行贸易，并且装着为人治病，引诱人们信教，还散发《英吉利国人品国事略说》等小册子，进行欺骗宣传。暗地里，他却派船上人员去测量沿途的河道和海湾，绘制航海地图，刺探各地的地形、驻军多少、武器装备、有几座炮台、几尊大炮、有什么物产及商业贸易等情况，并一一作了记录。

胡夏米和郭士立在中国沿海侦察以后，向英国东印度公司报告说：“清朝国力十分虚弱，秩序非常紊乱，采取商议的办法，不会取得任何结果。对中国必须用武力恐吓，整个中国的舰队，也打不过一艘英国战舰。”接着，胡夏米又给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写信说：“只要一支小小的海军舰队，就足够对付中国了。船上载运六百人，以炮兵为主，以便进行陆上作战。”巴麦尊接受了胡夏米的意见，一方面极力主张英国政府发动侵华战争，另一方面对英国政府派到中国管理英人对华贸易的商务监督律劳卑下令说：一要大力推销鸦片，不要干涉鸦片走私；二要开辟商埠，在广州以外的其他地方发展英国的商业势力；三要在中国沿海找些海军据点，以便作为基地，在发生敌对行动时，保证英国海军的安全。律劳卑也说：“中国政府外强中干，使用武力恐吓，比用外交手段收效更大。”可他到广州以后，还没来得及实现武力挑衅就病死了。他的秘书查理·义律继任。

义律是个顽固的殖民主义者，他在广州活动以后向巴麦尊报告说：“必须使用武力。只要有一艘军舰到达白河口，就可以使清朝皇帝作出让步。”于是，巴麦尊派遣英国东印度舰队总司令马他仑少将率领“威里士厘”号、“拉尼”号、“阿吉林”号三艘兵舰来到中国，准备进行挑衅和武装示威活动。只是因为害怕挑衅活动引起清政府封舱，反而对鸦片贩子不利，又见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等在虎门已经设防把守，才没有敢贸然行动。不过，这也就证明了，在罪恶的鸦片“贸易”背后，隐藏着英国殖民者的更阴险的计划，就是武力入侵中国，实现扩张势力和奴役中国人民的目的。一场严峻的斗争摆在了中国人面前。

值得一提的是，广州人民对鸦片的走私活动十分痛恨，早就采取各种方

法和奸商污吏作斗争。渔民们自动组织起来，一旦发现走私的“快蟹”，就立即吹响螺号，召集渔船，前后截击或顺风纵火，烧毁烟船捉拿烟贩。他们把这叫做“蒸大蟹”。他们还到伶仃洋去袭击英国鸦片趸船，叫做“打鬼趸”。农民们则组织起来，捣毁转贩和吸食鸦片的“窑口”和烟馆。广州沙角以北的广济圩，是烟贩和烟鬼们聚集、烟馆林立的地方。一天，正当烟馆里毒雾弥漫的时候，附近的农民们突然闯进去，砸碎烟灯，踩断烟枪，抓住烟贩捆绑起来示众，烟鬼们吓得抱头鼠窜，围观的群众个个拍手称快。

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公元 1838 年 12 月），广州地方官押解了一个鸦片烟贩子到外国人住的洋馆前面进行绞刑处决。外国烟贩怕由此砸了他们的饭碗，便借机起哄闹事，捣毁了绞刑架，还逞凶打人。在场的群众奔走相告，很快就传呼了一万多爱国群众，聚集在商馆周围，愤怒地斥责外国侵略者践踏中国主权，一再贩卖毒品。随着“打番鬼佬”的怒吼声，石头、瓦块、碎弃物品一齐向外国鸦片贩子砸去，鸦片贩子抱着头躲进洋馆。群众又用石头、瓦块猛砸商馆窗户，打得外国鸦片贩子无处藏身，躲在墙角和窗下不敢出声。

林则徐禁烟

在清朝政府内部，对鸦片贸易有三种不同的态度：禁烟、弛禁、反禁烟。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是反对禁烟的主要人物。广东按察使许乃济主张弛禁鸦片：就是允许进口鸦片，允许本国人种植，但禁止官吏和兵丁吸食。而一些正直的官员则主张禁止鸦片。他们当中，以林则徐最为坚决。

林则徐（1785—1850年），字少穆，是福建侯官（今福州）人。他从政多年，一直清正廉洁，对西方世界也有很多了解，一贯主张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技术，富强中国。但是，他对鸦片贸易深恶痛绝。

在任湖广总督的时候，他就采取严厉的措施禁止鸦片，成了禁烟派的代表人物。后来，他又上书给皇帝，驳斥反对禁烟的谬论。他大声疾呼，如果再不禁烟，中国将没有可抵抗侵略的兵勇，也没有充作军饷[xi ng]的银子了。道光皇帝被林则徐的慷慨陈词打动了。他决定禁烟，在道光十八年十月（公元1838年12月），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州主持办这件事。林则徐信心十足地接受了任命，在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公元1839年8月10日）到达广州。

在广州的街头上，一些骨瘦如柴、脸色黑灰的“大烟鬼”有气无力地缩身在墙角里，不住地打着哈欠，鼻涕眼泪一齐往外流。那些商贩守着店铺货摊，却无人来买。身穿便服进行私访的林则徐看到这令人心酸的情形，心里非常激动。他觉得要想彻底禁烟，非得先从内部整顿不可。一定要查出并严办那些走私鸦片的汉奸和贪官，让老百姓的精神振奋起来。

过了几天，林则徐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去检查几个书院，提出要对学生进行考试。考场的大门关得严严的，学生们紧张地等待着发考卷。考卷发下去了，学生们打开一看，都愣了。原来考卷里面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此次考试，可以不答试题，但是必须把自己知道的烟贩姓名、住址和活动情况写出来；对官兵受贿走私的内幕，更要写明白，不得隐瞒。书院的学生来自四面八方，知道的情况很多，又大都年轻活跃，对鸦片走私也深恶痛绝。大家默默地写了起来。林则徐威严的面孔也露出了笑容。

林则徐用种种办法，终于查清了走私鸦片的情况，严惩了一些违法官兵和烟贩子。然后，他发出了通告，主要内容是：一切外国商人必须在三天内缴出全部鸦片，并写出永远不再贩运鸦片的保证书。今后如再查出鸦片，按犯罪论处：货物没收，犯人处死。

消息传到外国商人居住的广州洋馆里，烟商们都慌了手脚，就有一些人交出了鸦片。可有的人还要看看再说。这时候，驻在澳门的英国商务监督查理·义律急匆匆地赶来了。他把商人召集起来，对他们说：“听说有几个人交出了鸦片？真是软骨头。你们不要怕，更不能把鸦片交出去！”商人们为难地说：“可这么硬拖下去也不是办法呀！”义律杀气腾腾地说：“感谢上帝，英国的军舰就在附近的海面上，我们随时准备打！”商人们听了，立刻活跃起来，交头接耳地议论着。

可是，他们的密谋已经被在洋馆里做工的中国工人发觉了。就在义律策划让几个大鸦片贩子偷偷逃跑的时候，洋馆外面忽然响起了一片喊声。义律和外商们从窗口向外一望，只见几百个中国工人把洋馆围得水泄不通。他们高呼着：“英商立刻交出鸦片！”“不许烟贩子逃跑！”在义律的掩护下，有名的英国鸦片商颠地正要逃跑，也被洋馆里的中国工人逮住。这件事很快

传到林则徐那里。林则徐已经得知义律到广州策划拒交鸦片的事。听说中国工人自动起来和鸦片贩子斗争，他非常兴奋，发出通告说：“鸦片一天不绝，本大臣一天不离广州，决不半途而废！”

林则徐接着果断地下命令说：“根据我们的一贯作法，他们既然拒绝交鸦片，还策划逃跑，中英贸易就只好中断。我们要派兵封锁洋馆，撤退馆中的中国人员，断绝洋馆通往海上的交通。他们若再抗拒，就要停止食物供应。还有，我们的水军要严密监视英国舰只的行动！”

困在洋馆里的义律得到林则徐的通令，再也无计可施。他紧张地思索了一阵，便铁青着脸对商人们说：“我决定了。你们把鸦片交出去！”商人们吃惊地望着他，他狞笑着又说：“可这件事并没有完。我要报告女王陛下政府，要求派兵惩罚他们。不久，我们就要打仗了！”

就这样，英国商人交出了他们的鸦片，一共二万余箱（包括美商的一千五百多箱），共约二百三十七万斤。

这么多鸦片怎么处理呢？林则徐决定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他叫士兵在海滩上挖了两个方形的大池子，都有十五丈见方，叫销烟池。池的前边挖有涵洞，后边通水沟。销烟前，先把水从沟里引进池里，再制成卤水。

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公元1839年6月3日），林则徐率领广东各级军政官员，来到虎门海滩边的高岗上，亲自指挥和监督销毁鸦片。这天，天气十分晴朗，成千上万的群众闻讯赶来，海滩周围人山人海。

销烟开始了。一队队打着赤膊的工人和士兵们把鸦片箱子扛来，又用力把箱子劈开，将鸦片切成碎块投入蓄有卤水的销烟池里。销烟池上搭着木板，站在木板上的工人和士兵，把早已准备好的石灰用铁锹撒入池内，还用力地搅拌着。不一会儿，池里的卤水和鸦片翻滚起来，烟油上冒，烟渣下沉，一股浓烟冲天而起，直上云霄，霎时间弥漫了海滩的天空。

人群沸腾了！大家不顾那刺鼻的恶臭味，欢呼跳跃起来。有的说：“再不禁烟，我们的子弟就成了废人，前途不堪设想啊！”那些不久前还吸食鸦片的人，更是感慨万分，对身边的妻子儿女说：“再不禁烟，我不只是卖房卖地，养活不起你们，自己也要倒毙街头了。”

那些被林则徐特意邀请来观看销烟的外国商人，眼看着鸦片变成废渣泡沫，随着潮水从大坑的涵洞中排入大海，不得不低下了头。有一个美国商人走到林则徐面前，庄重地脱帽鞠躬，表示由衷钦佩。林则徐微笑着对他们说：“我们禁的是害人的鸦片，不是正当的贸易。你们只要遵守我国法纪，与我们互通有无，我们是欢迎的。”商人们侧耳细听，有的还点头称是。

鸦片连续焚烧了二十多天，直到五月十五日（公历6月25日），才全部销毁干净。在这二十多天里，虎门滩上天天象过节一样热闹。青少年们更显得十分活跃，他们歌唱欢呼，奔走雀跃，十分开心。而林则徐已经在冷静地思索着下一步的行动了。他十分清楚，义律是决不甘心失败的，战争很可能就要发生。对付侵略可是比禁烟更要紧的事。

大战前的挑衅

林则徐在虎门销烟的壮举，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斗争勇气，给了那些不法外商沉重打击。美国、荷兰和葡萄牙的商人见势不妙，按照林则徐的要求填写了不再夹带鸦片的保证书。林则徐则准许他们开舱贸易。

对此恨之入骨的义律却一面指示停泊在澳门的英国商船上的商人不许具结保证书，一面又连续给英国外交部写信说：“林则徐禁烟是不义的暴行，不仅侵犯了英国商人的生命财产，而且也侵犯了英国女王的尊严，我军应立即发动对华战争，保护英商的利益和女王的尊严。”英国政府早就有发动对华战争的预谋，接到了义律的信件后，更加紧了筹备。

林则徐也作好了应战的准备。他深知鸦片贸易是英国的主要财源之一。中国实行禁烟，等于卡他们的喉咙，他们一定会借机扩大事态，进行武装入侵。因此他在严行禁烟的同时，会同水师提督关天培，亲自察看了海口形势，在虎门口外伶仃洋西一带海口要隘，加强和修筑了防御工事。在外船进口必经之地的武山和横档山之间，安设了两道木排铁链，并在武山添修了一座炮台，安设了六十门大炮，其他海防要地，也添置了武器装备。

林则徐和关天培大力整顿官兵，关天培亲自负责操演，练习袭击来犯敌人的战斗准备；又招募了五千渔民和疍民（以船为家的水上居民，疍 dàn）壮丁，组成水勇，教练他们袭击敌船的技能，准备协助水师对敌作战。广州附近的群众深受鸦片之害，纷纷要求参加抗英斗争，林则徐让他们组成乡勇团练，在外敌入侵时，“人人持刀痛杀”。

林则徐不是顽固保守的官僚，而是一位思想活跃的政治家。为了了解敌情，他派人翻译外文书报，用心研究国际形势，了解世界各国的情况。他不仅是反对侵略的爱国主义者，而且是最早“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人之一。

道光十九年五月二十七日（公元 1839 年 7 月 7 日），也就是虎门销烟结束十几天以后，一群英国士兵在九龙的尖沙嘴喝酒行凶，打死了村民林维喜，还打伤了许多妇女儿童。林则徐通知义律交出凶手，义律竟蛮横地加以拒绝。林则徐通告澳门居民，停止向英国人供应柴米食物，撤出为英商服务的中国人员。澳门民众积极响应，使英国人无法在澳门生活，只得溜到海面商船上躲避。

这年公历 8 月，英国的巡洋舰“窝拉疑”号等几条战舰开到了广东海面。义律象打了兴奋剂一样，态度顿时强硬起来。他处心积虑想法试探中国军队的虚实，为大打侵略战争作准备。七月二十七日（公历 9 月 4 日）中午，义律和“窝拉疑”号舰长士密乘坐装有十门回旋炮、四门三磅长筒炮的军用小艇“路易沙”号，率领装备六尊六磅炮的巡洋舰“珍珠”号，和装备有十八磅炮的军用快艇等五只英国兵船，趾高气扬地驶到九龙海面。下午二时半，他们先派一只船靠拢由参将赖恩爵带领的正在执行任务的中国水师巡船，要求购买食物。水师官兵刚要问话，英国舰船突然向中国水师巡船开炮，水师兵丁欧仕乾猝不及防，被英船炮弹打中牺牲。

赖恩爵火了，让三只水师巡船放炮还击。官兵接到命令，马上开炮。一只英军双桅飞船准备顽抗，被水师炮弹击翻，在漩涡中直打转转，英兵纷纷落水。水师官兵又集中火力轰击“路易沙”号，吓得义律和士密无处躲藏，龟缩在角落里呼救。下午五点钟，配备精良武器的“威廉要塞”号、“窝拉疑”号、“甘米力治”号等军舰艇船赶来增援。他们仗着船多势众，一齐猛

轰中国水师巡船。水师官兵冒着敌人的炮火连放大炮，英军“甘米力治”号船长得忌刺士为了保护义律和士密，率领水手驾船靠近“路易沙”号，攻击中国水师船。水师船的官兵用火绳枪回击，英兵一个个应声倒下，得忌刺士刚要举手射击，被一颗子弹打断了手腕，“啊哟”一声倒在了血泊之中。这时候，九龙炮台的中国炮兵也发炮接应，义律的帽带被子弹击掉，他急忙率领英国舰队仓惶而逃。

英国人在九龙挑衅吃了败仗，感到中国军民并不好对付，又采取缓兵之计。义律通过署澳门同知蒋立昂给林则徐写信说：“我们现在驾船到了澳门，并无别的用心，一定恪遵中国法度。请求你们不要猜疑，对我们温和相待，和平相处。”林则徐虽然对义律的态度表示怀疑，但是对他施展的两面派手腕还认识不足，因此，没有主动出击。

英国人利用这个机会赶忙调集舰队。巴麦尊给义律写信说：“政府将派遣海军到中国去，并配备有少量陆军，但是路途遥远，风向也不顺，最好是明年三月到中国。那时就可以封锁广州到北京的河口，占领舟山群岛或厦门作为基地。”义律接到巴麦尊的信件，态度又强硬起来，通知英商不要具结作出不夹带鸦片的保证，公然违反中国禁令，可是停泊在澳门的数十艘英国商船不进口卸货，船上的货物都会潮湿霉烂，损失太大。商人们都不愿意了。“但麻士葛”号的船主弯刺不顾义律的禁令，向中国方面提出申请，保证不夹带鸦片，被引进黄埔贸易。紧跟着，“皇家萨克逊”号的船主当郎也背着义律具结。其他英商也对义律很不满意，准备具结进口。义律觉得弯刺和当郎等的行动不仅破坏了自己的威信，而且也不利于他早已预谋的战争步骤，于是又有意挑起了“穿鼻之战”和“官涌之战”。

九月二十八日（公历11月3日），义律调集“窝拉疑”号、“海阿新”号等英国军舰，开到位于虎门三十里外的穿鼻洋面，这是各国货船具结入口到黄埔贸易必须经过的地方。义律要拦截具结入口的英国商船。当已经具结的“皇家萨克逊”号正要入口的时候，“窝拉疑”号和“海阿新”号驶到前面拦阻，强迫“皇家萨克逊”号折回。“皇家萨克逊”号船主当郎坚持要进口卸货贸易，不愿返回。双方便争执起来。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闻讯乘船赶来，询问是怎么回事。“窝拉疑”号上的英军突然对着关天培的船开炮。关天培奋不顾身，持刀挺立在船头命令本船官兵开炮回击。“轰隆隆”一声，中国炮弹击中“窝拉疑”号船头，英军纷纷滚跌入海。这时候，清军的援军赶来了。他们连轰两炮，击破了“窝拉疑”号船的后楼，左右舱口上也被打穿几个窟窿，又有许多英兵落海。激战两个多小时，“窝拉疑”号帆斜旗落，仓惶退出战场，逃之夭夭了。“海拉新”号见势不妙，也跟着跑了。

义律逃回澳门，把在澳门的英国人一齐运到九龙尖沙嘴，准备在那里修理船舰，负隅顽抗。林则徐便下令在尖沙嘴以北的官涌山上修筑了炮台等工事，设置了海防，严加防范。

英国人又故意挑衅，先是派人下船、拿着刀枪偷偷摸摸爬上山坡，袭击官涌的清军防地，企图抢占炮台。清军参将陈连陞、守备伍通标等发现以后，派兵回击截拿，打伤英军二人，夺枪一支。侵略者见偷袭不成，又把军舰排列在海面上，一齐向官涌营盘开炮，企图轰平炮台。官涌守军居高临下，放炮回击。侵略者又改为用大船在正面向官涌营地开炮，把清朝守军吸引过来，然后派小船从两旁奔赴海岸，抢占山冈。山冈上和海面上的英军配合起来，企图一举扑灭清军，占领炮台。

清军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一方面在正面回击海上的敌人，又分出兵力迎击山冈上的敌人。他们冒着枪林弹雨向敌人冲去，手起刀落，数十名敌人死的死，伤的伤。其余的见清军来势凶猛，急忙滚下山冈，爬上了船舰。

此后英国侵略者又接连挑衅了几次，都被清军击退。义律见无法在尖沙嘴洋面立脚，又听说广东水师在船上装满引火之物，准备前来焚烧英船，只得率领船队狼狈逃到外洋去了。中英两国关系急剧恶化，道光皇帝得知此情，下令断绝了和英商的贸易。这样，战争的气氛更加浓厚了。

战争爆发

义律在广州附近武装挑衅的时候，英国政府正在加紧筹划对华战争。

道光二十年一月（公元 1840 年 2 月），英国政府任命英军少将、印度水师提督乔治·懿律（义律的堂兄）为全权代表，会同义律负责与中国的交涉事务。三月（公历 4 月），英国国会通过了对华军费支付案，英政府正式组成了侵略军。侵略军的兵力是：军舰十六艘，共载炮五百四十门；武装轮船四艘；运兵舰一艘；运输舰二十七艘；全副武装的海军一万一千人，陆军四千人。这支海陆联军的最高司令官是懿律，海军统帅是准将伯麦，陆军司令是上校布尔利。这年五月（公元 1840 年 6 月），英国侵略军的船舰陆续开到广东海面，和义律等人汇合起来，开始向中国守军发动进攻。从五月二十九日（公历 6 月 28 日）起，他们悍然封锁了珠江口，中国军队也进入了战争状态。从此，中英战争爆发了。因为是由鸦片问题引起的冲突，所以历史上把它叫鸦片战争。

在敌人的侵略面前，林则徐毫不畏惧。他在敌人可能攻入的海口处，都增派了守军，并且亲自移驻虎门，指挥驻军和水师防守，还拟定了奖励人民群众的具体办法：“杀一名英兵，赏银一百元。”当地渔民、疍民、乡勇等，纷纷组织起来，在水陆各路口把守，一旦侵略军来犯，就给予迎头痛击。

英军本打算以广东为突破口，打开中国的大门。但是他们人地生疏，为能在中国内海活动，就雇用了一些中国人领路，而这些领路人多有爱国之心，把英军活动情况辗转报告给林则徐。林则徐根据他们的报告，掌握了英军的行动情况，更加指挥若定。也有一些老百姓假装向英国人卖食品，驾驶小船靠近英国军舰，乘机配合水勇放火，焚烧敌人的船舰。英军被烧了几次以后，再也不敢把船舰停泊在一处了，更不敢上岸，害怕遭受“人人持刀痛杀”的命运，只好乘船舰在海面上游来荡去。船舰上没有淡水，他们到小岛上汲水，水又被当地群众放了毒，不少英兵中毒得病甚至死亡。义律原来信任的汉奸，这时候也有人转变了态度，站到爱国的立场上。英军只好将为他们作事的中国人全部遣散。这样一来，他们就变成了没头苍蝇，在广东海面乱转游，想打也无从下手。

懿律和义律见广东军民戒备森严，无隙可乘，便留下“都鲁壹”号等五艘船舰封锁广东海口，他们则率领大小四十三艘船舰沿海北上，进攻福建的厦门。

这时候负责福建海防的闽浙总督是从广州调来的邓廷桢，他也是禁烟派。厦门军民早就有了反侵略的准备。英国侵略军到达厦门海面以后，由“布朗底”号军舰先去侦察形势，探探虚实。舰长胞诘命令少尉尼科尔逊和翻译罗伯聃乘小船来到岸边，企图登陆侦察，被当地军民轰了下去。当大批人民群众和一部分清朝官兵在岸上聚集的时候，“布朗底”号上的英国侵略军连发两颗三十二磅重的炮弹，在中国军民中间爆炸，当时就炸死了六个人。这一下就激怒了中国军民。炮台上的清军立即向“布朗底”号开了火，岸上的清军也赶紧乘战帆下海，配合炮台进攻“布朗底”号。“布朗底”号一面应战，一面派人乘小船到炮台的墙壁上去贴告示，企图进行反动宣传。岸上的中国军民那里容得，未下海的清军向侵略者连放排枪，群众也用弓箭、石头、瓦块，一齐向小船击去。侵略军虽然只被射死一名，砸死一名，但是人人心惊胆颤，急忙逃上“布朗底”号军舰。

懿律和义律在厦门又碰了个硬钉子，便留下“伯兰汉”号军舰和一艘运输舰封锁厦门港，自己率领侵略军继续北上，来到了浙江舟山群岛的定海县海面。

定海是我国东南海防的前哨，又是北部和南部海防线的中间连接点，物产丰富，商业发达，在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都很重要。可是以浙江巡抚乌尔恭额为首的清朝文武官员丝毫不作反侵略战争的准备。道光二十年六月（公元1840年7月），英国侵略军的舰队到达定海的时候，当地文武官员还以为他们是来做生意的，军舰入港，一炮未发。侵略军头子伯麦和布尔利乘机威胁定海知县姚怀祥献城投降，传递来他们事先拟好的汉文照会说：“限你半个时辰，将所属一切海岛堡台投献。过了时辰，就要开炮轰击！”姚怀祥虽然惊慌失措，但是还不愿屈服于侵略者的威胁，马上找水师总兵张朝发商量，准备集中兵力，坚守待援。不料张朝发却搪塞说：“我是水师总兵，职责只是扼守海口，守城并不是我的责任。”实际上，这时候英国军舰已经进入海口，他既不守海，也不守城。姚怀祥看到指望水师协助守城已不可能，只好自己招募乡勇百姓，在城门上堆积土袋，准备拒敌守城，可是他还没有准备好，英国侵略军已经开炮轰击了，连水师也没放过。

刚发几炮，张朝发就左腿受伤，跌入水中，被部下士兵救起，送往镇海。水师群龙无首，乱成一团，船只有的被侵略军击沉，有的作了俘虏，水师很快溃散。英国侵略军长驱直入，占领了关山，然后从东门登梯上城，进入定海县城。县城内的乡勇、百姓寡不敌众，难以抵挡，英军终于占领了定海。姚怀祥走出北门，认为自己没有守住县城，不能不死，在普慈寺前的梵宫池投水殉难。

英国侵略军进入定海县城以后，对当地百姓大肆屠杀掠夺。他们闯进居民住宅，见人就杀，凡是金银首饰，细软衣料、名人字画、粮食蔬菜，无所不抢，甚至桌椅板凳、日用杂品，也被抢劫一空。经他们抢劫过的定海，居民宅院和大街小巷，到处躺满了无辜百姓的尸体和伤员。有的被刺刀刺穿了胸膛，有的被子弹打断了双腿，也有的被炮弹炸得肢体破碎。更惨不忍睹的是侵略军抓住反抗他们的人，用刺刀割开皮肤，然后灌进水银。水银流到的地方，皮肉裂开，他们就把人皮剥下来，将血淋淋的尸体高高吊起示众。

英国侵略者占领定海以后，派陆军司令布尔利管理定海军务，郭士立治理定海民政，招诱舟山群岛的百姓来这里居住，可是百姓害怕他们屠杀，谁还肯来？接着，他们又留下军舰封锁了宁波港和长江口，懿律和义律继续率领其他军舰北上。

大沽会谈

定海失陷和英军北上的消息传到北京，道光皇帝大惊失色。他觉得英国人原来并不是他想象的那么好对付，又对自己国家的力量产生了怀疑，再不提禁烟和主战的事了。但是为了维护“天朝大国”和皇帝的尊严，他先下令撤销了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和提督祝廷彪的职务，命令邓廷桢派水师赶赴浙江增援，派两江总督伊里布为钦差大臣，去浙江查办军政事务。可是又通过军机处传谕直隶总督琦善说：“如果英国舰船驶至大沽海口，不要开枪打炮；他们有稟帖投递，不论英文还是汉字，都将原件进呈。”琦善本来是弛禁派，这回又和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等勾结起来，结成妥协投降派，纷纷指责林则徐禁烟过激，惹下了大祸。有人向道光皇帝进言说，“英兵之来，是由禁烟引起的，”还造谣说林则徐接受了英国文书，私自销毁了。道光皇帝听信了他们的谗言，把定海的失陷归罪于林则徐，在给林则徐的上谕中斥责他说：“你对外断绝鸦片输入，鸦片并没有断绝；对内查办烟贩，烟贩也没有查办净尽。没有干出实事，反而制造了许多麻烦。想起这些，我就非常愤懑，看你有何言对我！”林则徐在奏折中回复说：“鸦片之害甚于洪水猛兽，执法严办，实在是为天下万世考虑。天下万世之人，也断没有以鸦片不必禁止的道理。查办鸦片以来，依赖皇帝的严明，已经取得成效，现有中外文件可查。虎门销烟，有外国人观看，他们已有详细记载，说天朝法令，足以慑服人心，中外传诵其文。自和外国商船写具甘结以来，他们已经不再夹带鸦片。唯有英国人不遵守中国法令，而且嚣张挑衅，我是奉旨和他们断绝贸易的。现在他们攻占我国城池，残害我国官兵百姓，罪恶昭著，不仅不能恢复通商，还应理所当然地加以回击。”对林则徐的这些正确意见，道光皇帝不仅听不进去，反而十分反感。

道光二十年七月九日（公元1840年8月6日），懿律和义律率领侵略军舰队到达天津大沽口外，把《巴麦尊子爵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转交给直隶总督琦善的代表千总白含章。在这封信中，巴麦尊首先污蔑林则徐的禁烟措施是对在广东的英国“信实”商人“强行残害”，并且轻视大英国国家特别委派的管理领事义律的职权，对义律横加凌辱。接着又提出五个条件：要求赔偿所缴出的鸦片烟价；割让给英国一个或几个岛屿，供英国人居住贸易；赔偿军费等等。巴麦尊在信中最后说：“大英国国家认为此事十分紧要，已派水陆军兵前往中国海域，一到中国，即封锁所有港口，遇到中国船只，就拦截拘留，并且占据中国之便当地方，作为英国军队镇守之地。中国如果不答应上述五条要求，必将战争不息。”

这哪里是什么信件？完全是强盗的口吻，是杀气腾腾的挑战书和通牒。琦善把这份“信”转呈道光皇帝以后，又上奏折夸大英国的军事力量说：“现到英吉利船舰式样，长圆共分三种。其中大的船身吃水二丈七八尺，还高出水面二丈有余。船舱分设三层，层层都有炮一百多位。”实际上，来到大沽口外最大的英国军舰“威里士厘”号，一共只载炮七十四门，虽然有三层，但是下层并没有炮座，只在上、中两层甲板上安设炮座。

可是琦善的夸大之词，确实吓坏了长年住在深宫、不明外界真相的道光皇帝。他为此吃不好，睡不着，命令琦善说：“来中国贸易的外国船只，稍有冤抑，立即查明惩办。上年林则徐查禁烟土，未能仰体大公至正之意，措置失当。英国现在前来请求昭雪冤抑，一定仔细查明，重治其罪。”按照他

的想法，只要把林则徐治“罪”，就可以让英国人出口冤气，使他们退兵。琦善看到皇帝已经动摇，就又上奏说：“英军船坚炮利，确实厉害，我们是根本打不过的。即使今年打退他们，他们明年还会再来。战端一开，战争就会没完没了。现在的办法，只有和谈，对他们好言相劝。”道光皇帝马上批准，同意在大沽和英国人谈判。

会谈前，琦善极力讨好侵略者，先让白含章对懿律和义律说：“总督（指琦善）对英国人一向有好感，曾经劝阻皇帝不要派满洲八旗兵到舟山群岛去，也不要把英国人赶出中国地面。”接着，他又派沙船给英国侵略者送去大批粮食和二十头阉牛、二百只羊、两千个鸡蛋和许多鸡鸭。英国人全都收下，而且看透了琦善是个容易对付的软骨头。

八月四日（公历8月30日），义律和琦善在白河口的大沽进行会谈。琦善一开始就低声下气地说：“英国人在广州确实是受虐待了，假如英国在广州进行报复和惩罚林则徐，林则徐是罪有应得的。但是你们提出的要求太多，我们一下子难以全部接受，我劝你们不如先提一部分要求。”义律趾高气扬地说：“一部分不行！你们必须答应全部条件，并且由朝廷批准签字。”琦善说：“这个我作不了主，一切问题都必须向朝廷请示。而且往返北京，需要时间啊！”义律说：“那不要紧，我们等着。”

会谈结束后，懿律和义律命令英国舰船去海面游弋，并往山海关去察看海道、地形和清军的设防情况，侦察到山海关等处的清军只有弓箭，没有大炮，海防十分虚弱，然后回到大沽。这时候，琦善派白含章告诉懿律和义律说：“总督（指琦善）已经被任命为全权大臣，即将到广州去调查和申洗你们的委屈。他以皇帝的名义，请求你们到那里去会谈，商讨解决的办法。商讨期间，双方应该停火。”懿律和义律考虑到时近深秋，天气变冷，英军在北方不能适应，难以发动有效的攻势，才接受了这个条件，率领英国舰队离开大沽，起碇南撤。

道光皇帝听说英军撤出了大沽，以为英国人就是为了“伸冤”而来，又放了心。认为琦善和义律会谈是“片言只纸，连胜十万之师”；只要惩办林则徐，为英国侵略者“伸冤”，他们就不会开仗。

道光皇帝就是在这种心态下，于九月初三（公历9月28日），下令把林则徐、邓廷桢撤职查办。他在上谕中说：“前派林则徐驰往广东，会同邓廷桢查办鸦片，原期望肃清内地，断绝来源。但是他们查办以来，内而仍有奸民犯法，外而未断鸦片来源，反而使得英国船舰在我国沿海各省游弋，使我们纷纷征调军兵，将土疲劳，军饷浪费。这都是林则徐、邓廷桢办理不善造成的。现将林则徐、邓廷桢革职，严加议处。任命琦善代理两广总督。琦善未到以前，由怡良暂行护理。”

林则徐虽然被撤了职，但是他的功绩是抹杀不了的。林则徐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伟大的爱国者，在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中，表现了不屈不挠的精神。他的名字，和反侵略斗争联在一起，也和历史上最受人尊敬的民族英雄并列在一起。

侵略者无宁日

英国侵略军占领定海以后，定海附近的人民群众愤怒极了。他们拒绝和侵略者往来，还实行坚壁清野。定海街上，看不到一个中国人，更没有什么食物。连城郊地区，也见不到一只鸡。侵略军的后勤人员只得整天到沟渠河岔去钓鱼，但是所得很少，哪里够吃？至于蔬菜，根本没有。侵略军收买汉奸为他们到远处买新鲜食物。当地人民又展开了搜捕汉奸的斗争。一发现汉奸、买办，不仅不卖给他们食物，还要拘捕或穷追猛打，弄得英国侵略者没有新鲜食物可吃，即使有一点，也多被军官享用，士兵们处在半饥饿状态之中。

八月二十日（公历9月15日），英军的一艘三百吨左右的运输舰“风鸢”号在浙江慈溪县观海卫水面上游弋，并用两只舢板载着十几个人登上海岸，试图抢劫。当地群众发现以后，立即把他们围了起来，用铁锹、锄头、棍棒猛打，当场打死七人，活捉四人。“风鸢”号当晚又开到余姚县利济塘，企图在黑夜乘人熟睡不备的时候，放火抢劫。但是路径不熟，又是黑夜行驶，只听得“咣”一声巨响，“风鸢”号触礁，全船沉入海中。当地群众听到以后，立即围了起来，下海活捉了二十二名侵略军，其余的象落汤鸡似的，慌忙分头爬上“风鸢”号上装载的小船，摸黑四散，狼狈逃窜。八月二十三日（公历9月18日），一只英军小船漂到了上虞县的沥海所水面，碰到一只中国船，请求船上的中国船夫把他们带到定海去，说“只要到了定海，就重重酬谢你们。”恨透了侵略者的中国船夫不露声色，笑呵呵地说：“那好办！你们快上我们的船吧。”等侵略者上船后，船夫加劲驶船，把他们送到了中国军营，他们乖乖地作了俘虏。这批俘虏中，包括九龙之战的挑衅者之一，“甘米力活”号船长得忌刺士，还有已故“风鸢”号航务长拿布的妻子。

八月二十一日（公历9月16日），英军马德拉斯炮队陆军上尉安突德带着他的印度仆人走出定海营帐，到城西的青林堍（aò）山上去测量地形。当他们走到一条山间小路的时候，中国爱国群众包祖才突然从路旁跳出，一锄头就把那个仆人打得脑浆流出，死在路边。安突德见势不妙，拔腿就跑，想沿着山谷逃回定海营帐。可是忽然一声锣响，一群爱国百姓呐喊着立刻就集中到了山谷，有的用棒打，有的用石头砸，把安突德打倒在地，然后将他双手反绑，双膝并捆，为了防止他喊叫引来其他侵略军，还在他嘴里塞了一块破布。这个刽子手就这样作了俘虏，被转送到宁波知府衙门囚禁。

浙江人民英勇机智地活捉和击毙英国侵略者的例子还有很多。英国侵略者城内没有食物，出城抢劫，又遭受爱国群众的伏击，常常被抓住或打死。他们缺乏新鲜食物，在饥肠辘辘的状态中混日子，处境十分狼狈。接着，又因水土不服，有疟疾、发热症和痢疾病流行，留在定海的英国侵略军有四千人左右，生病的就达一千五百多人，有四百四十八人死亡，其余的也瘦得皮包骨头，没有了昔日的威风。

正在定海的英国侵略军处境十分狼狈的时候，懿律和义律率军从大沽南下到了定海。为了使英军脱离困境，他们向在浙江的钦差大臣、两江总督伊里布提出交涉。

伊里布是个投降派，早就主张弛禁鸦片，反对林则徐的禁烟措施。这时候，他因为自己控制着得忌刺士、拿布夫人和安突德等俘虏，就同意和英国人谈判。

九月初七日（公历 10 月 2 日），伊里布和来浙江的福建提督余步云，在镇海东岳宫会见义律和熟悉中文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双方围绕着交还俘虏和归还定海进行谈判。伊里布说：“只要英军先归还定海，我们保证释放安突德等所有俘虏。”义律则坚持说：“你们先释放安突德等人以后，再慢慢商量归还定海的问题。”伊里布又提出权宜之策说：“只要英国方面撤军一半，我就可以释放所有俘虏。否则，我不好向皇帝交待。”谈判没有结果。

英国侵略者为了摆脱在定海的困境，又提出双方“停战”。本来他们是侵略者，中国人民和军队有权进行反击，收复失地，谈不上什么“停战”。可伊里布害怕事态扩大，竟背着朝廷，私自同意达成协定。

十月十三日（公历 11 月 6 日），伊里布和懿律分别在协定书上签了字。这个协定规定：在中英两国谈判期间，双方停止战争状态，任何一方不得逾越所划定的界限。英方占领的地方是舟山岛及附近小岛，包括摘叶山、螺头、册子山、黄星山、青浜山、普陀山一线以内的所有岛屿以及鹿山各岛。

这哪里是“停战”协定？明明是向英国侵略者割让中国领土。伊里布也明白这一点，没有敢上奏道光皇帝，只是说懿律屡次请求他出告示，要求禁止百姓擒拿和杀死英兵，他才发布了十道告示。与此同时，他又派手下心腹张喜等人，带着大批牛羊鸡鸭去定海向侵略军“犒师”，并对懿律说：“安突德等人虽然作了俘虏，但是生活得很好，你们可以放心地去广东，以后再商量解决他们的问题。”懿律对张喜说：“你转告伊里布，让他多出告示，以后不许再逮捕杀害英国人，我才能到广东去。”并且拿出一张地图，指明英国侵略军所占领的地区。张喜一一答应了英国侵略者的要求，并转告了伊里布。伊里布立即宣告，再不许清兵和老百姓“逮捕和杀害”英国侵略军了。懿律吃了定心丸，才留下“布朗底”号船长胞沮为舟山地区的最高指挥官，镇守定海，自己率领舰队，继续南下。

在侵略者面前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说明清朝政府是多么腐败无能了。

琦善卖国

懿律率领英国舰队由定海南下的时候，清朝专办广东事务的钦差大臣、代理两广总督琦善也从北京启程了。琦善路过山东的时候，把原来充当外国鸦片贩子的买办、自己也经营鸦片贸易、林则徐曾经缉拿在逃的要犯鲍鹏带到了身边，让他充当自己和英国人交涉的代表。

琦善到达广州的当天，英国方面就通知他说：“英国舰队海军少将乔治·懿律突然感染重病，不能执行舰队司令职务，已经辞职，其职务由伯麦准将接替。与中国方面的交涉事宜，由义律为全权公使。”琦善急忙派遣委员张殿元、白含章和鲍鹏三人去看望义律，取得联系。这三人之中，只有鲍鹏会说一点英语。

琦善到广州前，英国侵略者就着手进行战争准备，不仅把适于在珠江作战的“复仇神”号、“硫磺”号、“司塔林”号等舰船调到广东海面，而且命令原来在华的英国军舰船只制造爬城的梯子等用具，为攻占广州城和夺取炮台作准备，还在广东洋面对奉命撤回营盘的广东水师船只进行轰击。可是，一心讨好洋人，求和心切的琦善对这些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一切行动都听从鲍鹏转达来的英国人的意见行事。英国人提出林则徐在任时采取的战备措施，包括战守设备，组织起来的水勇、壮丁，水下的暗桩等等，都是议和的障碍。琦善竟下令把战守设备大加裁撤，招募的几千水勇、壮丁全部解散，连准备抵御英国船舰的水中暗桩，他也下令全部撤去。这实际上为英国军舰进犯扫清了障碍。

义律又给琦善写信要挟说：“议和的障碍虽然排除了，但是如果多调兵勇到广州来，议和还是谈不成。”琦善果然不敢采取调兵遣将的措施，防备入侵。有人抓来汉奸和鸦片贩子请他处理，他当即面红耳赤地对抓获者说：“你就是汉奸！你就是鸦片贩子！”把他们一齐轰出去。也有人把探听到的英国侵略者的情况报告他，他则拒绝说：“我不象林则徐那样，身为天朝大臣，还整天探听外国情报。”他为了和英国侵略者谈判求和，干尽了卖国投降的丑事。在他的诱导下，汉奸和鸦片烟贩子又活跃起来了。

十一月十一日（公历12月4日），琦善和义律开始谈判。义律提出的主要要求是：赔款——赔偿英国烟价二千万两。割地——中国割让一个岛屿给英国，由英国人自治，以供他们居住和贸易；如果不给，就占据定海。其他——中国多开放港口，允许外国人开设商行进行贸易，赔偿英国军费等等。

开始，琦善害怕全部接受了义律的要求，会引起公愤，便除接受第三项外，还作了点讨价还价。他先提出赔偿烟价三百万元，义律降到一千二百万元，经过鲍鹏和义律等人磋商，最后议定为六百万两。至于割地一事，琦善表示自己不能作主，但是答应向道光皇帝代为请求。英国人见谈判达不到目的，又用军事手段施加压力。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五日（公元1841年1月7日）上午，英国侵略者用船舰把一千四百多名英军运送到虎门口外，登陆攻打沙角炮台（又叫穿鼻炮台）和大角炮台。由于琦善把林则徐设置的防御设施裁撤破坏，守军很少，英国侵略军又有汉奸带路，没有遇到什么阻力，就占领了山顶。守将陈连陞设法集合士兵抵抗，不幸胸部中弹牺牲。陈连陞的儿子陈长鹏和其他士兵义愤填膺，奋力抵抗，也战死了。琦善明知敌众我少，竟不发兵去支援，最后清军大都阵亡，英国侵略军攻占了沙角和大角炮台。

沙角炮台和大角炮台是拱卫虎门的要塞，这两座炮台失守，英国侵略军

就长驱直入虎门。广东巡抚怡良、广州将军阿精阿和副都统英隆等找琦善面商战守事宜，认为广州是省城重地，应当加强守卫。琦善仍然一意孤行，畏敌如虎，回答怡良等说：“如果派兵布防，就会妨碍议和大事。况且我们即使设防，也很难战胜英军。”这时候已经回到广州的邓廷桢认为一再退让，就不可能达到议和的目的，要求和琦善商量抵抗敌人的策略。琦善根本不加理睬。镇守虎门炮台的关天培等将领见英国侵略军已经逼近虎门，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派总兵李廷钰回广州哭着向琦善请求调拨援兵，琦善也丝毫不为所动，坐视不理。李廷钰一再请求，琦善才敷衍答应说：“秘密派二百人去。”李廷钰嚎陶大哭，不肯离开。琦善气狠狠地说：“去了也是送死。再不能添派一兵一卒了。”李廷钰无法可想，跑回虎门报告了关天培。关、李二人抱头痛哭了一场，只能率领部下少数士兵对付强大的英国侵略军，死守炮台了。

琦善却派鲍鹏偷偷地去穿鼻会见义律，恢复了和义律的谈判。义律在谈判中气焰更加嚣张了，限期要琦善答应他们所有的无理要求。琦善竟出卖主权，在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公元1841年1月21日），口头答应了义律拟定的《穿鼻草约》，规定中国割让香港本岛及其港口给英国，赔偿英国烟价六百万元，开放广州海口贸易等条款。

琦善答应了《穿鼻草约》以后，英国侵略军耀武扬威地占领了香港，并贴出香港归“英王管治”的布告。

虎门之战

琦善向英国侵略者屈膝求和的态度，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展开斗争。香港居民把英国侵略者张贴的布告撕下来，送到广州，抗议琦善的卖国罪行。广州人民得知琦善私自出卖香港的消息，立即表示激烈的反对。主张抵抗的士绅和知识分子集会要求清政府驱逐侵占香港的英国侵略军。清政府的许多爱国官员，也纷纷上书要求罢免琦善，重新起用林则徐和邓廷桢，继续反击英国侵略者。广东巡抚怡良见爱国热情日益高涨，害怕把自己也牵连进去，急忙把琦善答应《穿鼻草约》，既赔款六百万两，又割让香港等事报告了道光皇帝。

道光皇帝原以为一旦惩办了林则徐、邓廷桢等人，英国人就会交还定海，罢兵息战。不料侵略者贪得无厌，不仅没有交还定海，反而提出更多无理要求，强硬地要求割让海岛，坚持增设通商口岸，企图长期盘踞。他感到这太伤了“天朝”和皇帝的尊严了，在震怒之下，他又转向主战一边，一面宣布绝不答应赔款，一面命令沿海各省总督、巡抚加强防御，并通知湖南、四川、贵州三省集调军队四千名，到广东去攻剿英国侵略军。英军攻占大角、沙角两炮台的消息传到北京以后，他更加愤怒了，立即下令对英国宣战，命令伊里布即日进兵，收复定海；命令琦善激励士卒，驱逐英国侵略者；又派他的侄子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增调各省兵士一万七千人，到广州去和英军作战。

其实，道光皇帝对英宣战，并不是决心抵抗侵略者，主要是向英国人“示以声威”，以便取消赔偿烟价，收复定海、沙角、大角等失地。因此，当他接到琦善一份奏折，见上面说英方情愿交还定海，退出沙角炮台，但是要求居住广东外洋香港地方以后，内心又动摇起来，认为琦善有委屈求全的“苦衷”，准备就此了事。但是已经下了让奕山等率军去广州和英军作战的命令，难以收回了。

道光皇帝正在举棋不定的时候，突然接到怡良揭发琦善私自答应《穿鼻草约》，给英国侵略者赔款和割让香港，并且英军已经占领香港的奏折。这使道光皇帝顿时又震怒起来，立即下令没收琦善的全部家产，把琦善锁拿进京，命令奕山迅速集合各路军队，兼程去广州攻剿英国侵略军。奕山未到之前，由参赞大臣杨芳先去督办。

义律得知清朝增兵广东的消息以后，认定清政府不会批准《穿鼻草约》，便决定先发制人，向虎门发动了进攻。二月三日（公历2月23日），英国侵略军借口中国人在亚娘鞋群岛后方堵塞了一条水道，阻止了英军，派荷伯特率领“复仇神”号等船舰，冲进亚娘鞋群岛背后的小河，蛮横地拆除了拦河木桩栅栏和八十门大炮，还把附近的工厂、民房烧毁。二月五日（公历2月25日），英国侵略军总司令伯麦派炮兵团陆军上尉诺尔斯率军登陆到下横档山，当晚就在山上安设了三门大炮，使这里成为英军进攻虎门其他炮台有利的炮兵阵地。与此同时，英国侵略军又有十八艘舰船驶向虎门，把上横档和永安两个炮台包围了起来。第二天，英国侵略军从下横档炮轰上横档，水面上的敌舰也发炮猛轰上横档和永安两炮台。守台清军英勇还击，但是因为弹药不够，又无援军，渐渐失利。英国侵略军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运送英军在上横档后方登陆。由于这里的设防措施被琦善下令撤除了，守台清军腹背受敌，英军人多势众，攻占上横档炮台。接着，永安炮台也落入敌人之手。

英军攻占上横档和永安两炮台以后，紧接着又集中兵力进攻水师提督关天培驻守的镇远炮台。关天培是江苏山阳（今淮安）人，当时已经六十一岁了。敌人冲上来的时候，他手执大刀，指挥部下和英军拚杀，并且身先士卒，带头冲向敌人。在他的激励和带动下，所属官兵人人争先，个个奋勇，杀得前面的敌人死的死，伤的伤，后面的敌人怕作刀下之鬼，赶忙退了回去。伯麦又命令英军冲了上来，关天培仍然率军迎战，奋勇杀敌，经过激烈战斗，击退了英军的多次进攻。伯麦见强攻不能取胜，就集中了几百门大炮，疯狂地轰击镇远炮台。镇远炮台附近，被轰得砂石乱飞，焦土四溅，空中被炮烟、泥土笼罩。关天培全身上下受伤几十处，满脸是血，仍然从容指挥部下清兵发炮还击，不断往来于各炮之间，鼓励士兵誓死抵抗。有的士兵中弹倒了下去，他就亲自动手发炮回击。

关天培和清军将士们一直坚持战斗到当天晚上，尽管他的部下伤亡惨重，但他毫不气馁，继续指挥剩下的士兵和英国侵略军作殊死战斗，并且多次亲自点燃大炮回击敌人。不料他亲自点燃的那门大炮质量太差，自己炸裂，关天培受了重伤。有的士兵说：“向后撤吧！”军官麦廷章大声喊道：“事情危急，撤到哪里去？”说着背起关天培，想离开敌人轰击目标。关天培挥动着战刀说：“我决不能离开战场先走！”就在这时候，敌人的一颗炮弹飞来，关天培的胸部受伤，当场壮烈殉难。麦廷章含着眼泪继续指挥守台士兵和英军拚死搏斗，一直战斗到四百多人全部壮烈牺牲，英军才占领镇远炮台。

悲壮的虎门之战结束了。中国军队的失利，完全是琦善等卖国官员放弃抵抗，拒不发兵援救的结果。

侵略军攻下虎门以后，把军舰开进了内河，占领了乌涌炮台。这样，广州的门户完全敞开了，侵略军逼近了广州城郊。

《广州和约》的真相

英国侵略军逼近广州城郊的时候，奉命先到广州去督办军务的杨芳还没有到达广州。广州知府余保纯见兵临城下，吓得亲自到英军“加略”号船上去求见义律，请求停战。义律也正想先测探和熟悉内河虚实，弄清江流情况，摸透杂乱的水道，为下一步的侵略作准备，就答应余保纯停战三天。三天刚过，他就派兵占领了二沙尾岛上的中流砥柱炮台，并且发布告示威胁说：“如果清朝官员危害英军驻防，英军就以威力对付，使广州全城不得安宁；如果英国商人和中国商人之间的买卖受到阻止，广州全城就别想再有商业。”广州官员虽然向英国船只发放了贸易许可证，可侵略者还是攻陷和毁坏了邻近广州城的各个要塞和炮台。广州城完全暴露在敌军的射程之内。

这时候，参赞大臣杨芳才到了广州。他立即也转向妥协投降派。义律因为当时英美鸦片贩子都急于把他们从印度和新加坡运来的鸦片存货在广州高价销售，再把广州收购的茶叶运送回英国，增加英国政府的财政税收，就向杨芳提议停战通商。杨芳立即同意。停战期间，伯麦去印度调集援军。可是这时来到广州的奕山和隆文，却丝毫不作战守准备。

奕山是个既不懂军事，又没有对敌作战决心的清朝贵族。他一到广州，就给道光皇帝上奏折说，“患在内而不在外”，污蔑积极抵抗侵略者的广东人民是“无赖之徒”，要“防民甚于防寇”，把当地人当作“汉奸”，把广东的军队看成“贼党”，任意逮捕杀害。他宁可派人到福建去招募新兵，也不使用广东的士兵。对从外省调到广东的将领，他也不信任，而让亲信西拉木、岱昌等满族文官当大将，把军队弄得一塌糊涂，毫无纪律。奕山和隆文、杨芳自己，则派人争相购买钟表等洋货及古玩字画，挑选美女，日夜饮酒作乐。

停战维持了两个月，英国又调来了援军。奕山和西拉木、岱昌等人为了报销大量军费和侥幸取胜，向道光皇帝报功，就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轻率地决定向英军发动进攻。而这时候，英军的力量已经增强了，也正要发动进攻呢！

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初一日（公元1841年5月21日），奕山下令分兵三路，分别由提督张青云，总兵段永福，副将岱昌等率领，进攻虎门的英军。当天夜里，他又派都司胡倭伸率领一千七百多名新招募的水勇和士兵，暗带火箭、火弹、喷筒和钩镰，乘小快船去袭击英国船舰；还派兵包围了珠江岸上的洋馆，乘势发炮轰击。奕山听见炮声隆隆，看见火光冲天，满以为是击毙了英国兵，烧毁了英国的军舰，等到天亮以后查看，才发现夜里所烧毁的，全是中国民船。洋馆里的英国人，早在包围以前就撤退了。

从第二天起，英军发动反攻，首先进攻西炮台。守台的张青云不敢抵抗，急忙撤退，英军登陆破坏了防御工事，抢夺了大炮，并毁坏了停在炮台下的七十多只沙船和火筏，还烧毁了民房店铺，抢劫了洋行。接着，他们来到天字码头和泥城炮台，只放了几炮，驻守码头的段永福、岱昌就望风而逃，清军一哄而散。只有驻守东炮台和海珠炮台的清军，对英国侵略军进行了还击，打中双桅船“阿吉林”号，迫使英军后退修船。但是这时候，其他炮台失守，英军已分左右两个纵队强行登陆。这两个炮台孤掌难鸣，只得退下阵来。英军乘势拦截过往民船，把货物烧毁，把男人和老年妇女推入水中，年轻妇女被拉到他们的舰船上，受尽污辱。

四月初五日（公历5月25日），英军进攻广州城北的四方炮台（又叫永康炮台），总兵长春率领清军扼守，和英国侵略者展开激烈战斗。他们先用大炮轰击敌人，敌人一窝蜂似的端着快枪刺刀从四面八方冲了上来，大炮难以发挥威力。守台兵勇立即冲出营垒，和敌人展开肉搏，虽然自己伤亡惨重，仍然英勇拚杀，给侵略者很大杀伤，终因孤立无援，寡不敌众而失败。

四方炮台失陷后，广州城北的其他炮台也接连落入敌人之手，侵略军占据了城北的制高点，控制了广州城外所有的险要地方，把广州城完全包围起来了。奕山命令一万八千多清军全部撤入城内，紧闭城门。官歪兵也不正，清军聚集在一处，不想如何抵御城外的敌人，却不时地为一些小事发生争吵甚至斗殴，湖南兵和广东南海义勇还发生冲突，在广州城内东门校场互相厮杀起来。

英国侵略者利用四方炮台等居高临下的地理优势，把广州城内的情况看得一清二楚。他们先把火箭、火弹射向城里，烧毁了很多店铺民房，广州居民也被烧死烧伤不少。接着侵略军运来了火药，在四方炮台架起大炮，根据汉奸的报告，猛轰广州城中的两个大火药库。火药库顿时爆炸，火浪冲天，又烧毁了很多房屋，使不少军民被烧伤烧死。奕山和隆文害怕被烧死，每人提着一个装满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的箱子，准备混在散兵之中逃跑。后被人认出，才没有逃脱。广东按察使王廷兰认为大家坐守广州等于束手待毙，请求奕山拨出一部分军兵主动袭击敌人，以解广州之围。可是奕山已成惊弓之鸟，生怕惹恼了侵略者，坚决不许出兵。

第二天，英军在汉奸的指点下，集中火力，猛轰奕山等官员的住所——广州城东南的贡院，门窗全被炮火炸得粉碎。奕山等人被吓得魂飞魄散，面无人色，躲在墙角抖成一团。他一面派人在城墙最醒目的地方挂起白旗，请求英国侵略者暂缓轰击；一面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由和外国人做生意的商人伍绍荣介绍，去见侵略军将领卧乌古。余保纯见到卧乌古，先行了三跪九叩头的大礼，然后才递上奕山的投降书。卧乌古又转给义律。四月初七日（公历5月27日），余保纯和义律缔结了卖国的停战协定《广州和约》。和约规定：奕山率领所有清军在六天之内，撤出广州六十里以外；限一星期之内，交付英军六百万“赎城费”；赔偿英国商馆损失三十万元；这些款项付清后，英军才交还横档及其他要塞，退出虎门以外。

奕山等人搜刮了广东布政使司、盐运使司、海关三库储存的所有存款，才得到二百九十万元，又勒索商人财产二百万元，才凑够四百九十万元现钱。剩下的一百一十万元，用债券和欠据支付了侵略者。英国人等钱到手后，才归还了广州城外的炮台，退出虎门。

奕山不敢把《广州和约》的真实情况上奏道光皇帝，却谎报说，“我军出击，大获全胜，英军狼狈逃窜外洋”，还恬不知耻地保荐了一大批“有功”人员。为了促使朝廷批准屈辱投降的“和约”，他又向道光皇帝撒谎说：“英军将领战败乞怜，向城脱帽敬礼，求我转恳皇帝开恩，准许他们象以前一样通商，并请求归还历年以来商人欠他们的款项，我已允许英国商人前来贸易，并代还了商人欠款。”道光皇帝深居皇宫，也不明真相如何，糊里糊涂地下谕旨说：“准令英人照前通商。”他以为从此“天下太平”了，又下令撤回调往广东的各省军队，命令沿海各省裁减官兵，以节约开支，并从严惩处了林则徐和邓廷桢，把他们发往伊犁充军。

清朝官员的昏庸无能，在广州事件中暴露无遗。英国侵略者更加嚣张了。

平英团大战牛栏冈

和奕山等民族败类相反，广州人民对外国侵略者，进行了坚决的抵抗。城郊人民不顾奕山等人发布的禁令，自动组织起来，参加反侵略的斗争。香山人民组织了五百名水勇，派水性好的人潜水凿穿敌船船底，袭击停泊在白鹅滩的英军船舰，使侵略者难以应付。新安人民组织了火船队，分三队乘黑夜偷袭虎门的英军兵船，烧毁敌舰一艘，击毙英军多人。分散在田间劳动的农民，一有机会，就攻打零星出来活动的英军。英军占领泥城和四方炮台以后，到处杀人放火、奸淫妇女、掳掠财物，甚至连棺材里死人的东西，也被他们抢走，这就更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的义愤。

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初九日（公元1841年5月29日）早晨，有一伙英军官兵到广州城北郊的三元里作恶。他们看见一个妇女，就把她围起来，百般调戏。有个叫韦绍光的青年菜农见了十分气愤，把几个乡亲叫在一起，对他们说：“我们就这样看着他们欺侮妇女吗？”

“打！让他们有来无回。”大家都这样说。

“我也是这个主意。”韦绍光说：“趁他们现在不注意，我们就打他个措手不及。”说着，他带着大家冲了过去。

那些英军官兵正在放肆地大笑，冷不防一群中国农民围了上来，大声喊着，“打”，有的举起锄头，有的抡起扁担，朝他们打了起来。这些强盗吓得一个个哇哇乱叫。挨了一阵痛打以后，有七八个英国兵倒在地上，剩下的仓皇逃跑了。

韦绍光马上鸣锣聚众，叫村民们到三元里村的北帝庙前集合，商议对策。韦绍光说：“洋鬼子打到广州以后，天天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谁不切齿痛恨？今天早上他们挨了揍，一定要来报复。下一步怎么走？请父老兄弟们多出主意。”村民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开了。有的说不如暂时躲避一下，可多数人认为要马上组织起来，以防敌人来犯。有人提议组织“平英团”，专门对付英国侵略军，大家都同意，又推举韦绍光等人为首领，赶紧做好抵抗的准备。

韦绍光把神座前的黑底白边的三星旗举起，对着大家说：“我们就借神旗作为平英团的大旗和指挥旗。请父老兄弟们对着大旗宣誓。”接着，他带领大家对着大旗宣誓说：“旗进人进，旗退人退。脚踏故土，头顶苍天，杀绝英夷，打死无怨。”

韦绍光等人又派人到四周各村去联络，结果当地一些有名望的文人和士绅也参加了进来。当天下午，三元里附近的一百零三乡村民和手工业行会组织都派代表到三元里北面的牛栏冈开会。会上决定：十五岁以上和五十岁以下的男子一律出动，各乡自成单位，联合对敌。具体办法是：把盘踞在附近四方炮台的敌人诱到丘陵起伏的牛栏冈，一举歼灭。当天夜里，各村群众都忙着收拾和赶制各种武器，准备参加战斗。

第二天清晨，五千多名平英团战士在三星旗的指引下，一齐杀向了四方炮台。螺号齐鸣，鼓声阵阵，把炮台上的英军惊呆了。他们紧张地注视着黑压压的人群，连大气也不敢喘。夏天的天气十分炎热，不一会儿，他们都汗水淋漓，浑身湿透了。忽然“咕咚”一声，一个少校军官由于紧张过度，热昏了过去。英军司令卧乌古急忙让人抢救，哪知道他已经咽了气。卧乌古无可奈何地皱了皱眉头。但是，卧乌古再仔细看看围过来的人群的时候，又露

出了得意的狞笑。原来，他发现这些人拿的都是木棍、铁锹、锄头、大刀、长矛……凭这些武器怎么打得过他的洋枪洋炮呢？他连声下命令：“快，放枪！开炮！给我打！”于是士兵们便胡乱放起枪炮来。一阵枪炮过后，卧乌古定睛一看，平英团的战士一点儿也不害怕，高举着旗帜和盾牌还在挑战呢！卧乌古气坏了，决定只留少数英军留守炮台，自己率领一千多英国军队出击，向平英团扑来。

韦绍光指挥队伍且战且退，向三元里方向转移。英军以为老百姓软弱可欺，趾高气扬地紧追不放。追到牛栏冈丘陵地带，道路越来越窄，侵略军只能排成单行，大炮等笨重武器也不能跟随前进，这样就和平英团拉开了距离。

等到他们追到牛栏冈的时候，平英团的战士都不见踪影了。卧乌古见势不妙，慌忙下令撤退，可已经来不及了。就听号角声响彻云霄，埋伏在周围的群众从四面八方冲杀过来，双方展开了交手战。洋枪洋炮在这么近的距离内发挥不了多大作用，英军只能四散奔逃，到处挨打。

就在这时候，一道电光闪过，倾盆大雨从天而降。英军火药被雨水淋湿，吓得心慌意乱，便想突围逃走。平英团战士却如鱼得水，越战越勇：大刀在敌群中挥舞，英军官兵连连毙命，长矛向敌军乱刺，英军官兵应声倒地，不少人头破血流，满地打滚。邓潜率领的打石工人和陈棠率领的纺织工人也赶来投入战斗。妇女和儿童们为勇士们送汤送饭，呐喊助威。

雨越下越大，道路、水沟、稻田成了白茫茫的一片，无法区别辨认。英军官兵晕头转向，穿着长统皮靴在水中深一脚，浅一脚地乱窜。有的滑倒跌落水沟，有的陷在稻田的泥泞中拨不出脚来。怕死的连忙举手投降，跪在地上磕头求饶，乖乖地作了俘虏。直到傍晚，侥幸活着的英军官兵才在四方炮台留守英军的接应下，连滚带爬地逃出牛栏冈丘陵地带，窜回炮台。

卧乌古拖着疲惫的身子，一边喘气，一边查点人数，发现第三连没有一个人回来。一打听才知道，原来英军撤退的时候，第三连被三元里的人民截住了。他们为了逃命，就一个挨一个地结成方阵，一步一步地向后退，可这并没有救了他们的命。英勇机智的三元里群众用带钩的长矛，把敌人从方阵里一个一个地钩出来，然后用锄头、铁钯打死。

战斗结束了。三元里的田塍[chéng]间、小丘上、道路边、树林内，到处是英军尸体。枪支、弹药，更是遗弃遍地。这一仗，平英团战士一共打死英军二百多人，其中有两名校官，还活捉了十几个俘虏，缴获了两门大炮和许多洋枪、洋刀。

第二天清晨，广州附近的番禺、花县、南海、佛山等县的四百多个乡的群众也闻讯赶到三元里，和三元里群众合起来，十多万人包围了四方炮台。昨天领教过大刀长矛滋味的侵略者龟缩在炮台里不敢探头，只盼望援军早日赶来。

义律率兵前来援救，也被群众围住，动弹不得。义律在惊恐交加的情况下，想到了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他派了一个汉奸带着信，伪装成抗英群众混出重围，去给广州知府余保纯送信。信中恫吓余保纯说：“你们必须立刻驱散包围英军的群众，否则我们要扫平广州城。”其实他们连四方炮台都冲不出来，还谈得上什么“扫平广州城”呢！可余保纯吓得面无人色，急忙去找奕山。奕山已经被英国强盗吓软了骨头，立即派余保纯去设法解散愤怒的群众。

余保纯急忙跑到四方炮台，先向义律声明清朝当局并不知道这件事，请

求英方谅解。他让英军派出一个军官，和他一起向群众求和。平日气势汹汹、不可一世的英国强盗，没有一个敢出来的。卧乌古只好指定少校摩尔与余保纯同去。摩尔硬着头皮刚走出四方炮台，一见群众的大刀长矛，就吓得浑身打哆嗦，连滚带爬地逃回去了。余保纯也不敢象往常那样作威作福了，又是打躬，又是作揖，欺骗群众说：“当局已经和英军讲和，洋人以后再也不会抢掠、欺负你们了。你们就赶快回去吧！”有的群众当面骂他是通敌卖国的狗汉奸，他也不敢回嘴。

对愤怒的群众无计可施，余保纯又转过头来威胁参加围攻英军的士绅说：“如果不解散围攻队伍，事情闹大了，由你们负全部责任！英方要索取的赔款，也都由你们出。”士绅是官吏在村镇的代表，余保纯的恫吓威胁，使他们软了下来。有的领着自己的亲友走了，有的帮助余保纯劝说群众解散。这样，仓促集合起来又缺乏严密组织的群众才逐渐散去。

厦门失守

当时的英国政府是极富有侵略性的政府。义律在中国这样卖力地侵夺，英国政府还觉得不满足。1841年4月（道光二十一年三月），义律把由他拟定的、琦善答应过的《穿鼻草约》送到了伦敦。英国政府认为勒索太少，大为不满，连忙撤销了义律在中国的职务，改派野心更大、更加狡猾的璞鼎查为全权代表到中国，要发动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以索取更多的权益。

璞鼎查在当年六月二十四日（公历8月10日）来到澳门。他在整顿商务和布署军事的同时，派秘书麻恭到广州向清朝地方当局交出一份议和“纲要”，威胁说：“如果不派出全权代表，接受‘纲要’上所列的全部条款，我们就要率领大军北上天津。”而当广州知府余保纯前往澳门求见璞鼎查，想问明具体情况的时候，璞鼎查又拒而不见，传出话来说：“我们根本不准备在广州进行谈判，要赶快向北进军。”可见，他早已下了扩大战争的决心。

七月初五日（公历8月21日），璞鼎查留下少数陆军和“鳄鱼”号等五艘军舰驻守香港，自己率领十艘军舰、四艘轮船、一艘领航测量船、二十二艘运输船，分载二千五百一十九人、三百三十六门大炮，气势汹汹地从广东海面北上。这是英军第二次北上了。

七月九日（公历8月25日）黄昏时分，英军舰队来到福建厦门青屿口门。厦门地方官知道以后，派人询问英国人的来意。璞鼎查给福建水师提督龔振彪写信说：“除要求中国接受我们去年在天津所提出的一切条件外，请你放弃厦门，把厦门的所有堡垒交给我们。”当时龔振彪不在厦门。正在厦门的闽浙总督颜伯焘和驻守金门的总兵江继芸决定拒敌，一场保卫战开始了。白石头、屿仔尾和鼓浪屿的守兵，从三面抵抗英军。

第二天中午，英军左队开炮进攻鼓浪屿，右队猛轰厦门沿岸的炮台。守军开炮回击，但是由于重炮安设在炮台的墙门里，墙厚门深，炮筒只能直射，不能左右转动。英军看到这情况，让舰船避开炮台直射路线，从两侧进攻。守台清军连连开炮，不能击中英军舰船，英军舰船冲进厦门内港，用舢板船把士兵运到岸边，强行登陆，猛攻鼓浪屿炮台。守台清军争先恐后，英勇出击，和敌人展开殊死的搏斗，他们手中的刀矛被敌人打掉，就拣起石头砍砸。在战斗过程中，总兵江继芸、副将凌志、都司王世俊等将领相继阵亡，士兵也牺牲了很多，剩下的士兵硬拚不过，退了下來。英军强占了鼓浪屿炮台。

鼓浪屿是海上通往厦门的咽喉要地，它的失守，给清军心理上很大压力。接着，英军又在厦门南普陀附近登陆，越过城南郊区，逼近了厦门城南门。颜伯焘见无力把守厦门，当天晚上率军退到石寨，后又退守同安县。

第二天清晨，英军进入了厦门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清朝设在厦门的水师造船厂、铸炮所、火药库等，都被英军破坏得不成样子，各种器材、火药等物资。对他们有用的就搬走，搬不动和对他们没用的就放火烧毁。仅抢掠的金条和银条，就价值二万余元。璞鼎查留下三艘运输舰和五百名士兵占据厦门、鼓浪屿等地，自己则率军继续北上。

留在厦门的侵略军继续烧杀抢掠，为非作歹。他们公然闯进店铺和百姓住宅。见到金银首饰、衣服布料、桌椅用具以及粮食等等，没有一样不抢的。见到妇女，就追上去强行调戏奸污，有稍不顺从的，就被活活打死。甚至不少老年妇女和未成年的女孩子，也被他们糟蹋。他们抢劫奸淫之后，又放火把房屋烧毁。当地人民恨透了他们。

有个姓陈的农民实在看不下去，就串联了好几百名忍无可忍的群众，集合起来商量惩治英国侵略者的办法。他说：“我们只有少数长矛、大刀，别的就是锄头铁锹、菜刀铁铲和扁担木棍，拿着这样落后的武器，去和敌人硬拚，肯定会吃大亏的。得想个好主意才行。”大家决定采取灵活机动、突然袭击的办法，对付几个或十几个零星出来活动的英军。击杀这些少数敌人以后，立即分散隐蔽起来。他们还利用自己熟悉山弯道路、沟河拐岔的条件，设埋伏打击敌人。再挖些陷阱，捕捉敌人。

义民们的办法，果然有效。侵略者出来抢劫的时候，多次掉进陷阱，被义民们打死。三五成群出去活动的侵略者，每次都受到义民的袭击。几乎他们出现在哪里，哪里就有义民神出鬼没地打击他们。义民们勇敢机智、机动灵活地随处打击侵略者，他们防不胜防，处处吃亏，整天疑神疑鬼，偶然树丛里飞出一只小鸟，他们也以为是义民袭击来了。到了夜里，更是忐忑不安，屋里老鼠的活动，屋外猫狗的叫唤，都使他们惊慌万分，不敢入睡。

姓陈的农民还领导五百义民驾驶小快船，在深夜袭击和焚烧停泊在厦门港湾的敌人船只，使满船的粮食、煤炭、弹药突然起火爆炸，烈焰腾天，船只和所有物资都化为灰烬，沉入大海。船上的侵略者爬上岸边，义民又用抬枪和大刀、长矛等武器奋力击杀，不少侵略者作了刀下之鬼。

英国侵略者在义民的沉重打击下，难以在厦门立脚。不久以后，他们不得不撤出厦门，退守鼓浪屿。

三总兵定海捐躯

前面说过，英国侵略军曾经在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侵占过定海。后来由于浙江人民的强烈反抗，英军物资供应严重不足还常被活捉或打死，实在待不下去了，就在第二年年初，从中国方面要回了得忌刺士、拿布夫人和安突德等二十多个俘虏，从定海撤退到了广东。定海总兵葛云飞在调来支援的安徽寿春总兵王锡朋、浙江处州总兵郑国鸿的援助下，率军收复定海，领导军民积极作抵抗敌人再来侵犯的准备。道光皇帝因为伊里布庸碌无能，没有遵照自己的命令“剿办”英军，也把他革了职，调来江苏巡抚裕谦来代替他两江总督的职务。裕谦是蒙古族人，也是积极主张抗战的官员。他一上任就到了定海，给定海增派了一千八百多名官兵，拨给五十门大炮，几万斤铁弹和几万斤火药，并支援葛云飞等增修了定海东西两面山头的炮台，在城南沿海地区修筑了一道长达五里的土城。

但是道光皇帝是个反复无常，没有主见的人。他一会儿命令裕谦调兵遣将，增加定海的防御力量；一会儿又说为节省开支，要裕谦裁减防守的军队；一会儿又要裕谦回到两江总督任上去管江苏、江西、安徽的事务，把定海方面的事情交给浙江提督余步云。裕谦手下的人也处处掣肘，弄得裕谦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候，璞鼎查率领英军从厦门北上的消息传到了定海，葛云飞马上给裕谦写了一封急信，请求增加兵船，以便和敌人进行海战；再请拨给两门大炮，架在城西晓峰岭山头，封锁山下通道。不料这封信送到镇海裕谦衙门以后，被他的文书截收。这个文书对葛云飞从来不带钱物向他贿赂，这次又空信而来很不满意，就假冒裕谦的口气在信上批示说：“定海一岛，本大臣已经周密布置。你一再讨要兵船、大炮，明明是夸大其词，向我要挟，预先为失败开脱责任。这是什么心肺！所请不准。”

葛云飞见到回文，莫名奇妙。有人劝葛云飞说：“英军快到定海了，你虽然忠心保国，可是上司不支持，事情难办，不如一走了之。”葛云飞慷慨激昂地回答说：“大丈夫以身许国，只能竭力杀敌，哪能临阵逃走？”他一直驻在定海城南靠海的半塘地方，并让王锡朋把守城西山间险道，郑国鸿防守城西南的沿海地区。

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十二日（公元1841年9月26日），璞鼎查率领英国侵略军来到舟山群岛洋面。葛云飞接到海上哨兵的报告以后，立即向全军发出动员令说：“英军并不可怕，我们齐心协力，就能打败他们。”并且当众宣誓说：“城亡与亡，只要我们活着，就不能让定海失守，我决不离开定海半步。”当天下午，璞鼎查派巴加和郭富乘船闯入定海城西南沿海港湾窥测形势，葛云飞在土城上命令士兵把炮口对准敌船，乘它们还没有进入内港的时候，迎头痛击。众炮齐发，打断了敌船桅杆，巴加和郭富慌忙乘船逃窜。当天夜里，璞鼎查又派三艘军舰和一只桅船逼近土城，开炮猛轰。葛云飞指挥各营士兵开炮回击，双方炮战到第二天中午，敌船无法靠岸，只好退到清军射程以外的洋面。

英军正面进攻失败以后，又调舰船绕到定海城西，炮轰晓峰岭下的石头炮台，企图从这里登陆进城。王锡朋指挥士兵埋伏在岩洞里，沉着应战。敌军接连放了三四百发炮弹，阵地巍然不动，守军毫无损伤，敌人没有敢靠岸登陆。与此同时，另一部分英军驾驶着舢板船，在定海城西南的竹山门登陆。

郑国鸿亲自带领士兵发炮轰击，英军连滚带爬，逃上敌船退走。

八月十五日（公历9月29日），英军在定海城南对岸的海岛五奎山下排列了五艘军舰，掩护炮兵登陆上山，支搭帐篷，建造可以安放三门重炮的炮台。葛云飞亲自在土城开炮轰击，打坏了英军五顶帐篷。军舰上的英军为解除葛云飞守军炮火的威胁，连发排炮向土城轰击，葛云飞守军忙于回击军舰上的敌人，放松了对五奎山英军的轰击，虽然打退了英国军舰，可登上五奎山的英军没有退下来。第二天，英军攻打定海城南的东港浦，又被守军击退。

另一支英军进攻城西的竹山门等处，并在傍晚乘小船登陆，五奎山上的英军也发炮轰击。防守这一地区的老将郑国鸿沉着应战，带领士兵全力阻击。弹药打完了，部下劝他后撤，他说：“大敌当前，只有向前，哪能后撤！”在他的鼓舞下，士兵们争先恐后，奋勇杀敌，再次把侵略者赶下海去。

当时定海淫雨连绵，城内城外一片泥泞，粮食接济不上，士兵们一天只能吃三碗饭，还忍着饥饿冒着雨，在泥水里坚持和英军作战。经过整整五昼夜的激战，士兵们疲惫不堪，面对强大的敌人，守城困难越来越大。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三位总兵不得不联名向在镇海的裕谦写信报告军情，请求火速派兵支援。可是在裕谦身边的浙江提督余步云是个贪生怕死的家伙。他一面借口镇海也处在危急之中，劝裕谦不要派兵支援定海，一面对送信的人说：“三位总兵这是小题大作。你回去告诉他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死守，不要光想着增兵。定海要是失守了，就拿他们问罪。”

三位总兵以民族、国家利益为重，只好忍气吞声，把这些见死不救的话咽到肚里。葛云飞害怕这些话传开会影晌士气，还忍着悲愤对大家说：“上司说镇海的军队胆小怕死，来了也不顶用。我们定海的将士英勇无比，连打胜仗，已经给敌人很大打击了，不需要别人的支援，也一定能取得胜利，还传令嘉奖了我们。我们受到上司的称赞，应当再接再厉，更加奋勇杀敌。”

八月十七日（公历10月1日），天还没亮，英军乘定海守兵疲惫而孤立无援，在五奎山英军大炮的掩护下，分两个纵队发动猛攻。第一纵队向晓峰岭进攻，利用舢板船登陆，攻占了一条通向定海城的险道。王锡朋见形势危急，首当其冲地率领士兵抬着土炮，逆着大风，怀着反抗侵略的决死精神，英勇堵击敌人。他们前队阵亡了，后队立即跟了上去；枪管和炮筒被火药烧红，不能再发射，还拚命死战，和敌人展开肉搏，一次又一次地打退敌人。战斗坚持到下午，英军登陆的人越来越多，王锡朋手抡大砍刀左冲右突，亲手砍死了几个敌人，不幸被敌人的炮火打中，断了一条腿后，壮烈牺牲。其他将领、士兵也因寡不敌众，先后受伤阵亡。英军攻占晓峰岭，为发泄兽性，竟然把王锡朋的皮剥下来，把他的尸体用刺刀戳烂。

侵略军接着乘胜进攻定海西南竹山门的郑国鸿守军。郑国鸿率领守军誓死抵抗，虽然身上数处受伤，仍然继续指挥战斗，不幸又一颗炮弹打来，郑国鸿也为国殉难，竹山门失守。

在英军第一纵队进攻晓峰岭和竹山门的同时，第二纵队进攻定海城南的东港浦的关山炮台，葛云飞指挥守军英勇抗击。由于竹山门失守，英军沿着土城东进，使葛云飞的阵地受到英军海中战舰、五奎山上的炮兵和东进部队的三面夹击。葛云飞见东进的英军威胁最大，命令士兵把大炮掉过头来，向西射击。不料炮身太重，陷在泥淖里不能转动。英军乘机冲杀过来，葛云飞带头率领守军和敌人以死相拚，他刚冲过去，就被一个侵略者迎面砍了一刀，血流满面。他忍着剧烈的疼痛，继续向前冲去，敌人的枪弹接连不断地射到

他的身上，他全身受伤几十处，仍然顽强的坚持战斗。突然飞来一颗子弹，打中他的胸膛，他站立不住，倒在岩石下边，壮烈牺牲。他的部下二百多人，也都怀着不甘屈服的反抗精神，前仆后继地和英军作殊死斗争，后在和英军短兵相接的战斗中，英勇殉难。英国侵略军第二次占领定海。

定海三总兵和守城士兵临危不惧，视死如归，表现了中国人民的无畏精神。他们永远被后人所敬仰。

如此“反攻”

英军攻占定海以后，匆忙在舟山群岛设立了以丹尼斯为首的所谓“军政府”，璞鼎查则率领舰队去攻打镇海。镇海在大陆一侧，和定海隔海相望。定海失守，镇海也就十分危险了。

在这里督战的裕谦决心与城共存亡。他率领文武官员宣誓：“文武将佐，敢于受夷一纸书，去镇海一步者，明正典刑，幽遭神殛。”这时候，他直接指挥的军队只有一小部分人，而大部分归浙江提督余步云指挥。裕谦和余步云约定好，分兵把守。余步云守招宝山，知府黄冕守鸡金山，裕谦守中军。谁知余步云竟假说有病，不去驻守。裕谦预感到镇海难保，便下了必死的决心。

八月二十六日（公历10月10日）凌晨，英军炮舰开到了镇海城下。裕谦亲自登城，擂响战鼓，指挥将士开炮。顿时硝烟弥漫，杀声震天。这时候，怕死的余步云忽然来了，裕谦顾不上理他。他犹豫了一会儿，对裕谦说：“我应该去战死，可家中老小百余口怎么办呢？我的女儿今天出嫁，如何是好？”裕谦厉声说：“儿女之情重要，还是忠义重要？”说完，又投入了激战。

余步云到底是临阵逃脱了，招宝山很快失守。接着，黄冕守卫的鸡金山也落入敌手。英军的炮弹集中射向镇海城。清军把守不住，终于溃散了。

裕谦悲愤交加，想到自己没有守住镇海，愧对黎民百姓，他大步走下城楼，向西北方向跪拜后，举身投入了河水。后被人抢救上来，送到小船上，他还昏昏沉沉地说着战事。船走到半道上，他终于停止了呼吸。

英军攻占镇海，便登上了中国大陆。他们沿着甬江而上，又去进攻宁波。逃到这里的余步云和知府邓廷彩、鄞县知县王鼎勋一听说英军来攻，立即逃奔到上虞去了。守城军兵见官员逃走，也纷纷溃散。英军于八月二十九日（公历10月13日），轻而易举地占领宁波。他们从宁波府库中掠夺了十二万元左右的现金和纹银，大堆大堆的铜钱和足够侵略军两年食用的粮食。至于丝绸、茶叶、瓷器等物，更多得无法计算。接着，英国侵略军以宁波为中心，向余姚、慈溪、奉化等地侵略，清朝官兵闻风而逃。英军如入无人之境，对这些江南财富之区，进行了肆无忌惮的掠夺。中国的主权遭到了空前未有的践踏。

消息传到北京，道光皇帝惊呆了。他万没想到，战争会发展到这一步。事到如今，也只能硬着头皮打下去。九月初四（公历10月18日），道光皇帝任命他的另一个侄子、协办大学士奕经为扬威将军，侍郎文蔚、副都统特依顺为参赞大臣，调集军队赶赴浙江，进行反攻。同时又升任河南巡抚牛鉴为两江总督、广东巡抚怡良为钦差大臣赶往福建，协助奕经在东南地区的反攻。

奕经和奕山一样，都是清朝腐朽势力的代表。他带着大批亲戚朋友和同僚故旧推荐的随员，在北京去江南的路上，不是游山玩水，就是观赏歌舞，饮酒作乐。经过一个半月，直到十月二十日（公历12月2日），才悠悠荡荡地到达苏州，又借口筹办军务，在这里逗留下来，派人到处搜罗美女，勒索供应贿赂，稍不如意，就甩盘子砸碗，辱骂当地官员。当地官员无可奈何，劝他向浙江进兵，他却逍遥自在地住了一个多月，根本不作收复失地的准备。举人臧纡青向他建议说：“浙江的老兵屡次战败，士气很低，已经不顶用了。眼下除调四川、陕西、河南的新军以外，最好的办法是招募民间乡勇，分成

小分队，分散在宁波、镇海、定海附近各地隐蔽，零散袭击敌寇，让他们防不胜防，疲乏不堪，再去歼灭。”奕经表面上同意这个建议，实际上却根本没有去做。

奕经在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公元1842年1月21日）才到了浙江嘉兴。四天以后，他说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英军放弃陆地，纷纷上船，逃到大洋去了。他兴奋地把这个梦告诉了周围的人，周围的人都逢迎说：“这是一个吉祥的预兆。”文蔚也连忙说：“昨天晚上，我也做了这样一个梦。”奕经十分高兴，胆子也变得大了起来，立即决定出兵，让没有做梦的特依顺驻守杭州，和他同梦的文蔚则领兵渡过曹江出击，自己前往绍兴，作反攻定海、镇海、宁波三城英军的部署。

奕经不仅迷信作梦，而且迷信神灵。他听说西湖关帝庙最灵应，就去祈祷了一签，签上有“不遇虎头人一唤，全家谁保汝平安”的话句。过了三天，应调而来的四川阿木穰率领的金川兵都头戴虎皮帽。奕经见了特别高兴，重重赏了他们。其他军兵听说以后也分别制作了黄虎头、黑虎头、白虎头、飞虎头等帽。又因虎在十二属相中属寅，他就决定在寅年寅月寅时寅刻（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四更，公元1842年3月10日）分兵三路，同时反攻宁波、镇海、定海三城的英军，并让属虎的四川提督段永福作反攻宁波的主帅。奕经以为三城之内都有内应，官军一到，内应就能立即抓住敌人，不费力气就可以收复三城，命令各军不要带火器、火箭，只带刀矛等短小兵器就够了。

不料，奕经信任的汉奸陆心兰向英军泄露了奕经的作战计划，英军早有了准备。段永福率军来到宁波，见城门开着，以为英军已闻信逃窜，命令阿木穰和黄泰分别率军冒雨攻打西门和南门。阿木穰率领金川兵进入西门月城后，埋伏在深坑里的英军射出的炮弹、枪子象雨点一样地飞来，金川兵在躲避中又踩着了侵略者埋设的地雷，四百多人全部牺牲。黄泰率军到南门后，英军退进城里，黄泰领兵追到紫薇街，和敌人展开巷战。守备徐宦握着长矛冲在最前面，见敌人就刺，刺得英兵“哇哇”乱叫。侧面的敌人把他砍了一刀，他还奋力冲杀，杀死十几个英兵，活捉了一个敌人。其他士兵也和敌人展开肉搏，英勇冲杀，只因没有携带火器，又没有接应支援，敌人还从两旁房顶用枪扫射，清军伤亡惨重。黄泰率领残余士兵退出南门，又有舰船上的英兵登岸，截住他们的后路。黄泰率军英勇奋战，敌人使用葡萄弹和铁筒弹猛轰他们，黄泰和五百多士兵壮烈牺牲。段永福见阿木穰和黄泰两军全败，只好率领自己的部队撤退。

反攻镇海的一路由副将朱贵和参将刘天保带领，刘天保直接进攻镇海城，朱贵进攻招宝山威远城。刘天保见镇海城楼起火，知道有人内应，立即率军冲去，但是当它们冲到城下的时候，内应已被英军抓住，侵略者列队而出，枪炮齐发，火力非常猛烈。刘天保见部下只有长矛大刀，难以对敌，率军撤退。进攻招宝山的朱贵所部非常英勇，他们冒着敌人的炮火，爬山而上，攻进威远城。不料一艘英国军舰开了过来，猛轰登上威远城的朱贵部队，朱贵所部没有重炮还击，被迫退下山麓。

第二天，朱贵率领的部队退到了慈溪城外的大宝山，英军跟踪追来。朱贵命令士兵用大炮轰击敌军的同时，亲自手执大旗，指挥部下迎击英军，多次打败英军的进攻。英军人多势众，被打退一批，又上来一批。朱贵的军队则孤立在大宝山上，饿了没饭吃，渴了没水喝。当时就在附近的余步云等带

兵退进慈溪县城，坐视不救。朱贵的部队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仍然忍着饥渴，以一当十，誓死格斗，火药用尽，就用大刀长矛和敌人硬拚。朱贵右手被敌人炮弹打断，还用左手撑着大旗，指挥部下和敌人短兵相接，直到敌人射中他的咽喉阵亡为止。他的儿子朱昭南、朱 南接过大旗，继续指挥士兵杀敌，也都被敌人炮弹打中牺牲。朱贵部下失去主帅以后，仍然坚持战斗，虽然阵亡了四百多人，全军覆没，但是也杀伤了很多敌人，遏制了侵略者的凶焰，使他们不敢再追击其他清军了。

反攻定海的一路是水路，由海州知州王用宾统领，以殉难定海的总兵郑国鸿的儿子郑鼎臣为先锋。因为定海在海中岛屿之上，进攻定海必须先坐船到岱山，而北方士兵在船上头晕目眩，不宜水战，王用宾招募了七千五百多名水勇，雇用了二百七十多只民船，让郑鼎臣率领，开到岱山。不料英军早有准备，派人把守了岱山，并有军舰守护。郑鼎臣率军攻打岱山，没有拿下。这时候已经逃到杭州的奕经因为反攻宁波和镇海的军队都已失败，命令郑鼎臣撤回。郑鼎臣因父仇未报，不听命令，并联络火船，活动在岱山和大嵩山两个小海岛之间，伺机进攻。三月初四日（公历4月14日），郑鼎臣派水勇火船冲进定海道头港，围攻停泊在那里的三只英国大船，烧得火光通天。郑鼎臣则亲自率领水勇，乘火筏进攻正在进行修理的武装轮船“复仇神”号。他们虽然没有烧毁大船，但是烧毁了不少舢板船，很多英军士兵也被烧死、淹死。郑鼎臣这才撤回。

奕经依据做梦和神灵启示所发动的“反攻”，就这样结束了。“反攻”的失败，完全是由他的瞎指挥造成的，他却向道光皇帝诬告说，失败是由于浙江人民都作了“汉奸”，把他的布署告诉了敌人，并且夸大英军的兵威声势，掩饰自己的罪过。为了防止人民群众组织起来成为反对他的力量，他还下令解散了郑鼎臣率领的水勇。

“黑水党”勇斗侵略者

和在广州的情况一样，英国侵略者虽然在东南沿海地区同清朝军队作战中得逞，它却无法抵挡当地人民群众的反抗和打击。

侵略者进攻镇海的时候，浙江沿海人民自动组织起来，封锁和防守海岸，击退英军的侦察船只。侦察船的大副嗝哩不甘心失败，带着二十几个士兵从另一处登岸抢劫，早有准备的人民群众一拥而上，用锄头、铁锹猛砍狠砸，砍伤并活捉了他们。英军占领镇海、宁波以后，广大人民群众更被侵略者到处烧杀抢劫的暴行所激怒。他们纷纷组织起来进行抗英斗争，其中规模最大的组织是宁波义民徐保、张太火、盛大才等人组织的“黑水党”。他们以宁波为中心，在镇海、定海等地也都有活动，随处打击敌人。他们平时分散隐蔽，一看见英军出来抢掠，就穿屋爬墙，矫健如飞，以神速的动作，灵活机动的战术袭击敌人，常常使敌人在冷不防的袭击下损兵折将。

在“黑水党”活动的中心宁波，他们平时分头隐藏在城厢内外，并在河中准备了好些八桨快艇，一到天黑，就四出袭击侵略军。侵略军头目为防止他们的袭击，派士兵出来到街巷巡查，经常是两人先后而行。可这样仍然逃脱不了惩罚。有时候后面的敌人已被“黑水党”人砍倒，前面的敌人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刚要回头看看，他的头也被人砍了下来。有时候，“黑水党”人穿戴上缴获的英军衣服、帽子和皮鞋，拿着竹杖，装出要和英军打招呼说话的样子，等到走近英军的时候，二话不说，突然把他们打倒刺死。有时候为了探听敌人虚实，“黑水党”人还准备了长布带子，从后面突然套住敌人的脖子，使他们不能说话，然后拖拉到小巷幽静处审问。

侵略者夜里在城墙上往来巡查，也常常被“黑水党”人擒拿。“黑水党”人摸黑隐蔽在城墙下，用长藤做成套环，等巡查英军士兵过来，故意发出一声怪叫。等英军士兵低头向下一看，他们就立即抛出藤环套住他的头，把他钩下城来，然后拿出破布塞进他的嘴里，不让他出声，把他反绑起来。城墙上的其他英军以为前面的人是失足掉下城墙的，也伸出头来向下看，又全被“黑水党”人用藤圈套下城去活捉。有时候一个晚上，就能打死和活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英军。弄得英军每到夜晚，就胆颤心惊，不敢轻易离开大营一步。

“黑水党”人不仅打死和活捉在黑夜里出来活动的侵略者，而且也常常在白天打击敌人。有一次英国侵略军运输船“衣那”号靠岸上水，他们把这只船的头目和两个随从引到岸边的房子里，打死一人，其他两人作了俘虏。又有一次，他们侦察到一个英军小分队正在争着分抢来的衣物首饰，就突然从房顶跳下，亮出明晃晃的大刀向敌人砍去。敌人吓得尖叫起来，坐在地上打颤。“黑水党”勇士不等他们醒过来还手，就飞步上前，手起刀落，结果了他们的性命，然后纵身上房，越墙而去。

“黑水党”人神出鬼没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英国侵略者。侵略者想不出对付“黑水党”人的办法，不得不考虑从宁波撤走了。

与此同时，台湾军民也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侵略斗争。

在一部分英国侵略者心目中，台湾对他们的重要性仅次于香港和舟山群岛中的定海，一直想攻占它。还在道光二十年六月十八日（公元1840年7月16日），英国侵略者的兵船就在台湾鹿耳门外游戈，被台湾道员姚莹和总兵达洪阿领兵打退。璞鼎查率军从厦门北上进攻定海的时候，就派了装载二

百七十四人的运输舰“纳尔不达”号等三艘三桅大船，到台湾去窥视挑衅，为他们下一步攻占台湾作准备。因为台湾海峡风浪太大，两只三桅船被阻停泊，只有“纳尔不达”号于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十六日（公元1841年9月30日）到达台湾基隆口外的万人堆洋面，然后开进基隆港，轰击二沙湾炮台，打坏一间守兵住的房屋。驻守在这里的参将邱镇功指挥士兵还击，打断英船桅杆及绳索。英军见桅折索断，害怕继续中弹，急忙掉头驾船逃出基隆口外，慌乱中触上礁石，一声巨响，“纳尔不达”号被撞成好几十块，沉没在大海之中，侵略军纷纷落入水中。“纳尔不达”号的船长和大副等三十四人像抓救命稻草似的，爬上该船预备的一只小艇狼狈逃窜，有七十五人被淹死。剩下的一百六十五人凫水爬上岸来，还企图负隅顽抗，继续逞凶。台湾的爱国军民冒着敌人的枪弹冲了过来，英勇追杀敌人，打死了三十二人，其余的一百三十二人乖乖地作了俘虏。爱国军民缴获了很多刀枪弹药，又在水中捞出了十几门大炮和几十颗炮弹及其他物资，大获全胜。

十月初二日（公历10月27日），又有英国舰船闯进基隆港内，轰坏了炮台石堡和守军营房，守军开炮迎头痛击，打死两个侵略军，英舰船头也被打坏。侵略军见不能得逞，仓皇退走。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三十日（公元1842年3月11日），英国双桅船“阿纳”号又装载着五十七个士兵和汉奸，在船长颠林的率领下，开到台湾淡水和彰化交界处的大安港附近，企图在方便的海口偷偷登岸，勾结逃往台湾的匪徒张从等人为内应，进行骚扰。因为他们接受了“纳尔不达”号触礁的教训，不敢开近岸边，只在附近游戈。当地的人民群众和守军发现以后，就派渔民周梓到海边打鱼，引诱敌舰。敌人看见周梓正在捅捞鱼虾，就凑了过去，要周梓给他们指引港口。周梓假装为难地说：“给你们指引港口，会耽误我打鱼的时间，我不干。”颠林和汉奸硬要他带路，他就把他们引到了大安港北边的土地公港，使“阿纳”号搁浅在暗礁上。预先埋伏在这里的人民群众和守军一齐拥出，枪炮弓箭齐发，“阿纳”号被打破下沉，敌人纷纷落水。虽然有几个人爬上舢板逃走，但是淹死了几个，又被群众和守军打死十几个，其余三十多人和一个汉奸，都作了俘虏。他们所带的十几门大炮及大批其他军械物资，也都被缴获。由于台湾军民严密防范和勇敢机智的斗争，英军不得不停止侵占台湾的阴谋活动，台湾人民避免了侵略者的烧杀和奴役。

东南沿海人民的反侵略斗争灵活又有效。但是腐朽的清朝政府不懂得依靠人民反击侵略的道理，致使大片国土沦丧敌手。

吴淞保卫战

奕经“反攻”失败后，道光皇帝再也提不起抵抗的精神来了。他任命投降派官僚耆英代理杭州将军，让伊里布为钦差大臣，到浙江去办理军政事务，并下命令说不得冒昧进攻英军，不准杀害英军俘虏，以便把俘虏作为向侵略者求和的资本。英国侵略者见此情景，得寸进尺。为了进行更大的讹诈，在增加了新的援军后，乘机向长江中下游发动了进攻。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九日（公元1842年5月18日），英国侵略者调集大军进攻浙江和江苏的海防重镇乍浦，在乍浦城南的天尊庙，遇到由佐领隆福率领的满族兵的英勇阻击。二百多满族兵见黑压压的一片英军冲了过来，立即迎头痛击，打死侵略军陆军上校汤木森，其他军官、士兵也死了不少。英军依仗着人多和武器精良，又冲了过来，攻占了守军阵地，然后堆起火药袋把它炸毁，并对隆福率领的满族兵发动猛烈的围攻。隆福冒着枪林弹雨率众突围，接连砍死好几个英兵，不幸阵亡。其他守军退到天尊庙内，继续英勇抵抗，火炮、弓箭齐发，又使敌人死伤了很多。但是守军人少，英军援兵不断而来，守军经过三小时激烈鏖战，最后失败。英军占领了乍浦。

侵略者毁坏了守军的要塞和全部设施，并纵兵大肆屠杀抢掠。屠杀抢掠后又纵火烧毁，使大半个乍浦城变为灰烬瓦砾，街上和河里到处是尸体。

接着，英军进犯到了长江出海口处的吴淞口。他们想突破吴淞进入长江，打入中国的内地。

驻守在吴淞的江南提督陈化成已经是六十六岁的老将了。自从中英开战以来，他一直密切注视着战局的发展，作了迎战的准备。他意识到，保卫吴淞使它不落入敌人的手里是多么重要。但是，一想到战争的前途，他又心情沉重了。两年来，由于国防虚弱，再加上投降派官员把持朝政，多少爱国官兵丧失了生命。陈连陞、关天培、定海三总兵，还有不知名姓的士兵们，都是因为腐败的官员贪生怕死，只落得空怀报国壮志而倒在血泊中。如今，吴淞的命运又将如何？

陈化成想到这里，派人把部下的官兵召集起来，严肃地说：“我二十岁投军，到如今快五十年了。在这几十年当中，出生入死的次数真是难以数计。人生在世，总有一死，为国捐躯，死了也值得。”停顿了一下，他又接着说：“英军倚仗的无非是大炮，我们也同样可以用大炮来对付他们。吴淞口有东西两座炮台，西台发炮，东台响应，东西密切配合，敌人腹背受敌，顾东顾不了西，必然失败。我们必定能够取胜！”将士们听了，都显出激动的神情，表示要同侵略者决一死战。

五月初八（公历6月16日），英军开始猛烈攻击吴淞。陈化成亲自率军把守西炮台，指挥将士们进行还击。敌人的枪炮子弹象雨点般地落下来，而他面不改色，手执令旗，镇定指挥。官兵们沉着应战，接连击毁了两艘敌舰，打死打伤了几百个侵略者，敌人的炮火终于被压了下去。英军指挥官急得哇哇乱叫起来。

就在这时候，有一顶大轿子在一队人马的簇拥下大摇大摆地朝炮台这边走来。这是两江总督牛鉴和他的仪仗队。牛鉴本来不会打仗，却要装出气壮如牛的样子。现在，他听说陈化成打了胜仗，便坐着轿子，威风凛凛地到前方来观阵，将来好为自己向上请功，落个亲临战场的好名声。没想到，他这十分排场的仪仗队被英军指挥官看见了。英军马上对准仪仗队开了几炮。

“轰！轰！”炮弹落在轿子附近，把牛鉴吓得大叫起来。他以为英军已经杀到跟前来了，也顾不上体面，慌忙扔了纱帽，脱了朝靴，钻到士兵中间没命地跑起来。他的几个亲信也一个劲儿喊：“不好啦！牛大人受伤了！”这一队人马连跑带叫地逃走了。

牛鉴带头逃跑，惊动了守卫在东炮台的清军指挥官。他也心惊胆战起来，丢下士兵不管，自己跑了。英军见东炮台无人指挥，一阵猛攻，冲了上去，东炮台失守。

守在西炮台的陈化成看到这一切，非常气愤。他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眼下，只剩下他这一支队伍还在坚持战斗。陈化成预感到形势不妙，但是他十分镇静，对着士兵大喊一声：“不要害怕！听我的命令：开炮！”

战斗更激烈了。集中了兵力的英军舰艇不停地进攻，双方距离越来越近，而清军的炮位因为不能自如升降，无法打击近处的敌人。很多将士倒了下去，陈化成也已经七处受伤。他用尽全身力气，不停地挥舞着红旗。

一颗子弹飞来，陈化成中弹倒在地上。他看见敌人已经登陆，向炮台奔来，就挣扎着站起来，拔出了战刀。英军登上了炮台，双方展开了肉搏战。陈化成奋力杀退几个敌人，终因流血过多，壮烈牺牲在炮台上。吴淞失陷了。

英军攻占吴淞以后，又攻取了上海、宝山，顺长江直下镇江。驻守镇江的两千多名官兵在没有增援的情况下，英勇奋战，决心与城池共存亡。英军用炸药轰开西门，爬上城墙，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向他们杀来。守城的满族八旗士兵奋不顾身地冲杀过去，和敌人进行肉搏战，打死打伤英军一百八十多人。有的士兵身负重伤，还抱住敌人一同滚下城去。血战到最后，没有一个人投降、退却和逃跑。

镇江也失守了，南京便暴露在敌人面前。还没等英军攻打，清朝政府已经吓破了胆，决定投降了。

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公元1842年8月4日），由七八十艘船舰组成英国侵略军的舰队，陆续开到了南京下关江面，马上摆开阵势，架列大炮，扬言要立即攻城。驻在南京的两江总督牛鉴慌忙派人到英国军舰上交涉求和。璞鼎查提出两个条件：第一，必须完全接受英方提出的赔偿鸦片烟价和这几年的作战费用，割让海岛，供英国人居住贸易。第二，要道光皇帝任命一个全权代表来谈判，才不攻打南京城。实际上是要清朝无条件投降。

牛鉴立刻把璞鼎查提出的条件报告北京。道光皇帝让耆英和伊里布前去商谈，还想从侵略者那里乞求一个有条件的投降。他秘密指示耆英说：“广东已经给过鸦片烟价，不能再给了；作战费用两国都有，也不能给他们；英国要求贸易的地方，可以把香港暂时借给他们，并允许他们到福建、浙江沿海贸易。”可是当伊里布和耆英相继赶到南京后，才发现自己完全处在侵略者炮口的支配之下，丝毫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以妥协向侵略者乞求和平，结果只能是无条件投降。

伊里布于七月三日（公历8月8日）到南京的当天就派张喜等五人给璞鼎查送去照会说：“我国没有全权大臣的官名，凡有钦差大臣字样的，就和贵国全权二字相同。皇帝派我和耆英来商谈通商之事，请你们按兵不要动，派人会谈，早日解决。”璞鼎查给伊里布的回信则说：“你和耆英不仅没有奉皇帝给的完全按照我们提出的条件办理的权力，而且是否都有钦差大臣的印章还是个问题。你们如果只奉命谈判通商问题，两国就不能和平，只有打仗了。”果然，到了七月六日（公历八月十一日），侵略者派萨勒顿和郭富各率一队英军，从燕子矶等处登陆，停在江中的英国船舰也都挂上红旗，舳板上架起了大炮，作出了攻打南京的架势。伊里布又赶忙派张喜等人给璞鼎查送去照会说：“我奉皇帝会同耆英便宜行事（斟酌所宜，自行处理，不必请示的意思）的命令。你们提出的烟价、码头等条件，都可以商量定义，然后订立合同，加盖钦差印章。如果没有奉皇帝的命令，这样重大的事情，我哪里能作主办理？”

七月七日（公历8月12日），耆英和伊里布派塔芬布、张喜、陈志刚到南京北门仪凤门外的净海寺，和璞鼎查派的麻恭、马礼逊、郭士立等逐条会谈。英方要求赔款二千一百万元，并要看道光皇帝让耆英和伊里布“便宜行事”的命令。中方没有答复。在第二天会谈前，伊里布告诉张喜说：“只说给他们清理以后的税务，不准再有商人拖欠英国人的钱，坚决不可答应给他们银两。至于要看有皇帝印章的命令，先不要谈这个问题。”张喜在第二天的会谈中遵照伊里布的话办了，英方没有达到目的，又用武力来威胁。马礼逊对张喜说：“我们只等到明天天亮为止，假如你们天亮以前不答应我们的要求，我们就开炮轰击南京。”耆英和伊里布经不起威胁，马上软了下来，增派了江苏按察使黄恩彤、汉奸颜崇礼等参加了七月九日（公历8月14日）的净海寺会议，把七月一日（公历8月6日）道光皇帝委派耆英、伊里布“便宜行事”的命令拿了出来。又过了三天，英国方面拿出了“和约草稿”，除以前提出的条件外，又增加了十多条要求。

七月十五日（公历8月2日），耆英、伊里布、牛鉴三人应璞鼎查的邀请，到英国军舰“皋华丽”号上去会谈。他们根本不对英国侵略者提出的条款进行磋商，却向璞鼎查大谈战争的危害，通商的好处等不着边际的废话。

璞鼎查为了炫耀武力，带领他们参观了船舰上的火轮机、有车轮的铜炮等。他们参观后向道光皇帝上奏说：“英国船坚炮猛，从前只是传闻。这次亲眼看见，确实名不虚传，也明白我国打不过他们的原因了。”

七月十九日（公历8月24日），璞鼎查和马礼逊等人到净海寺同耆英、伊里布、牛鉴会谈。因为接到了道光皇帝不准在福州通商的“上谕”，耆英派鹿泽长等去和马礼逊商谈，被马礼逊拒绝。耆英马上报告道光皇帝。道光皇帝也只好让步，说：“千万无可奈何之中，一切不能不免从所请。”这就给签定卖国条约开了绿灯。

七月二十一日（公历8月26日），璞鼎查等进入南京城和耆英等会谈条约，递交了马礼逊起草的条约草案。耆英等人并不逐条细看，只是草草一看了之，就全部接受了侵略者提出的要求。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公元1842年8月29日），耆英、伊里布、牛鉴等人，在英军的“皋华丽”号军舰上，签订了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因为在《南京条约》上，关于海关税率、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重大问题，还没有明确规定。后来又签订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补充。

在《南京条约》和其他补充条约中，清朝答应把香港割让给英国；赔款二千一百万元；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准许英国人租地建房，永久居住；协定关税；让英国享有领事裁判权（中国无权审判外国罪犯）；享受最惠国待遇（中国以后给其他国家的任何特权和利益，英国可以同样享受）。中国主权遭到严重丧失，中国人民遭到奇耻大辱。

《南京条约》签订后，一贯帮助英国侵略中国的美国资产阶级见英国得到那么多利益，非常眼红，就利用清朝政府的虚弱进行外交讹诈，派专使顾盛带领三艘军舰来到澳门，要求享受和英国一样的权益，并威胁说：“如果中国政府不答应我们的要求，我们就要使中国再尝战争的苦头。”清朝政府被外国强盗的大炮吓破了胆，立即派耆英和顾盛在澳门附近的望厦村和美国签订了《望厦条约》，使美国获得了《南京条约》及其附属条约的一切特权，而且在海关税、领事裁判权、侵犯中国领海权等方面，获得了更多的特权。

和中国交往不多的法国也来趁火打劫，派拉萼尼为专使，带着八艘兵舰来中国进行讹诈。卖国老手耆英干脆把中英、中美的条约各抄了一份，送给拉萼尼，让他选择最有利的条款。拉萼尼仔细研究了所有条款后，和耆英在黄埔的法国军舰上签订了《黄埔条约》，除获得了和英国、美国同样的特权外，还规定法国人可以在五口建造教堂和坟地，清政府要负责保护法国教堂和传教士的安全，解除禁止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禁令。

从此以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相继而来，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的大门被迫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开放”。中国人民在遭受封建主义的压迫的同时，又受到了外国侵略者的奴役，封建的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人民没有停止斗争

鸦片战争结束了。西方列强获得了巨大利益，清朝政府也保住了统治地位，得到了喘息的机会。然而，人民群众没有因此停止了反抗，他们痛恨侵略者，也痛恨卖国的清朝政府。反抗最激烈、斗争时间最长的，要数受鸦片和外国侵略者危害最深重的广州人民。

《南京条约》签定的消息传到广州，广州人民发出《全粤义民公檄》，声讨英国侵略者的罪行，号召人民群众团结起来，反对英国人在广州为非作歹。他们还成立了各种社学，把广州城厢内外的青壮年普遍组织起来。在社学的领导下，广州人民开展过多次反抗侵略者的斗争。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六日（公元1842年12月7日），一个英国水手在十三洋行附近向中国小贩购买水果，吃完水果后，一个钱也不给，抬腿就走。小贩追上去向他要钱，他反而破口大骂。街上的人看不下去，帮助小贩回骂这个强盗。这个强盗急忙跑进洋馆，叫来了一伙英国匪徒，端着鸟枪向街道冲了过来，野蛮地向人群射击，打伤了好些无辜群众。

社学的义勇们听到枪声，立刻跑来问明情况后，就派人冒着枪弹，把这伙匪徒围堵到洋馆里面。这伙匪徒继续从洋馆的窗口向外射击，打伤了很多社学义勇。广州人民被英国匪徒的暴行激怒了，当天夜里，就点火焚烧这伙匪徒盘踞的洋馆。先是浓烟滚滚，火光四射，接着洋馆变成火海，千万条耀眼的火舌在微风的帮助下，射向夜空。一阵噼哩啪啦的响声过后，洋馆东倒西歪，烈火还在继续燃烧。平日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英国强盗，吓得东窜西逃。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他们的欢呼声、咒骂声和拍掌叫好声交织在一起，震天动地。

腐朽的清朝统治者派出军队前来镇压，屠杀了十个爱国群众，并给英国侵略者赔偿了二十六万元所谓的“损失”。

道光二十四年四月（公元1844年5月），英国香港总督兼驻华公使德庇时和当时担任两广总督的耆英勾结起来，企图霸占广州河南的地方为租界。四月二日和三日（公历5月18日和19日）两天，德庇时还派人到这里划出了一大片土地，并插上了界标，打算在这里建立商行货栈，永久占领这块地方。广州河南四十八乡的广大群众看到他们祖祖辈辈开辟耕作的土地将要被英国侵略者霸占，愤怒到了极点。他们酝酿了几天，在四月七日（公历5月23日），召集了三千多人，一齐拥到洋馆找德庇时讲理，质问他凭什么要霸占他们的土地？德庇时害怕人民群众，躲在洋馆里不敢出来，打算派人叫耆英出面把群众压下去。还没等到他派人去找耆英，社学就贴出告示，义正词严地宣布说：“河南一带的土地，都是我们老百姓用钱置买的产业。就是官府，也不能随便夺去送给别人。即使花钱购买，也必须取得我们的同意。哪能让英国人随意霸占？”他们还散发传单，警告侵略者说：“如果你们硬要霸占我们的土地，在这里建立什么商行货栈，我们就要放火烧光你们的货物和行栈，还要砸烂你们的脑袋。”德庇时见广大群众情绪激愤，只好放弃霸占河南一带为租界地的企图。

后来，侵略者又歪曲解释《南京条约》，提出进入广州城的无理要求。耆英竟然答应了下来。在道光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公元1846年1月15日），派广州知府刘浚去和德庇时秘密商谈进城日期和有关措施，又贴出不准人民反抗的告示。社学群众知道后，立即撕毁了官府的告示，张贴出自己

的告示说：“如果英国侵略者胆敢进城，他们进城之时，全城百姓立即闭门起事”，并且散发传单，发动群众游行示威。

当天下午，好几千愤怒的群众陆陆续续地聚集到了广州知府衙门前面，把整个大街拥挤得水泄不通。他们敲锣打鼓，高喊口号，要求刘浚出来回答群众的问题。刘浚吓得慌忙命令手下人把衙门的铁门紧紧关闭起来。

群众怒上加怒，高喊了一声“他不出来见咱们，就冲进去见他！”十几个年轻力壮的社学义勇从衙门对面的影壁后边，找出一根砍倒的粗大树干来，大家就抬着这根树干，用力猛撞衙门的大铁门。仅仅撞了两下，大铁门就被撞开了。愤怒的群众象一股猛烈的洪水，一齐冲进知府衙门，直奔大堂寻找刘浚。

这时候，刘浚已经吓得瘫软在衙门东耳房的床上瑟瑟发抖，站都站不起来了。他的贴身亲随听到衙门外的群众正在撞击大门，就在慌忙之中用带子把他从衙门的后墙吊了出去，扶他躲藏起来。

群众冲进衙门以后，在大堂及其周围转了几圈，没有找到刘浚，只从墙角和床下拖出几个浑身发抖的衙役来，问他们刘浚哪里去了，才知刘浚已经逃跑。群众把他的官服、靴帽、朝珠撕破烧毁，然后呼着口号离开知府衙门。

从这以后，群众看见英国人进入广州城，就立刻围拢过来，对他们高声叫骂，直到他们狼狈逃窜，才分散开来。守门人受到群众爱国热情的感染，也不许他们随意进入广州城。

道光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公元1847年4月6日），德庇时突然率领一千多名英兵乘船闯进虎门，占领炮台，强行开进内河，再次向耆英提出要进入广州城的要求。广州人民调集了几千社学义勇，准备进行抵抗，并且宣布：坚决不许英国强盗跨进城门一步。

耆英只得派人对德庇时说：“眼下广州百姓情绪激愤，你们硬要进城，势必发生冲突，对你我双方都不利。我劝你们暂且退兵，两年以后再入广州城。”德庇时就顺水推舟说：“好吧，不过要订立一个协定。”于是，耆英和德庇时偷偷地订了一个两年后入城的密约，英兵才退出内河。

耆英回过头又来分化破坏社学，让士绅们劝说义勇群众不要采取“过火”行动。爱国士绅们回答说：“众怒不可犯，乡亲们的爱国行动，怎么能劝阻？”耆英没有办法，就向朝廷报告说：“广州屡次反对英人和冲击衙门的事，都是会党和匪徒鼓动干的。”朝廷命令他肃清“会党”和“土匪”，他就借机杀害了许多爱国群众和社学义勇。但是广州人民并没有被他的屠杀所吓倒。

道光二十九年正月（公元1849年2月），英国新任香港总督兼驻华公使文翰，率领满载大炮的舰队到虎门外示威，说耆英答应的两年后进城的密约已经到期，要按密约办事，进入广州城。广州各社学的群众知道以后，只有几天工夫，就集合起十几万人，作好了坚决反击英国侵略者进城的准备。接替耆英当两广总督的徐广缙见众怒难犯，在权衡利弊后，决定利用人民群众的力量，暂时抑制英国人，就通知文翰，不许他们进城。

文翰恼羞成怒，立即增调军舰，气势汹汹地闯进内河，扬言要进攻广州，社学义勇和人民群众也广泛地动员起来，作好了武装反抗侵略者的准备。

徐广缙在人民群众爱国激情的鼓舞和支持下，亲自到英国军舰上会见文翰，拒绝他们进入广州城的要求。英国侵略者企图扣留徐广缙，进行要挟。但这时社学组织了十几万群众，守卫在珠江两岸的长堤上，刀枪林立，呼声震天，正密切注视着英国军舰上的动静。一旦侵略者有所动作，义勇和爱国

群众就要枪炮齐发，弓箭齐射，和侵略者决一死战。文翰看到这种情况，知道自己如果坚持要进广州城，必然会吃大亏，只得把徐广缙送回岸上，表示愿意和好，不再进入广州城，然后率领舰队灰溜溜地离开了广州内河。

广州人民反侵略的斗争再一次证明，人民是最强大的力量，只有得到人民群众拥护，国家才强有力。清朝政府腐朽无能，不敢也不可能发动人民反对侵略，结果只能一败再败，给国家和民族带来无穷的灾难。

十四年后战争又起

1840年到1842年的鸦片战争，又叫第一次鸦片战争。既然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在清朝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也就是《南京条约》签订后的第十四年。它的起因和第一次鸦片战争有密切关系。

《南京条约》和《黄埔条约》签订后，英国和法国不断加紧向我国的渗透，妄图获得更多的特权。

咸丰六年正月（公元1856年2月），广西西林县知县张鸣凤下令把一个叫马赖的法国天主教神父和他的几个中国教徒逮捕了。本来，中法两国以前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并没有允许外国传教士到中国内地传教。可是马赖前几年偷偷地从广州到西林县传教，还招收了一伙地痞流氓当教徒。名为传教，实际上他们抢劫东西，强奸妇女，无恶不作。这自然触犯了中国的法律。张鸣凤把马赖和他的教徒逮捕，随后，将马赖和两个民愤极大的教徒斩首示众。

法国政府得知这个消息以后，硬说马赖是无辜受害，便通知英国政府说，要派远征军到中国。英国政府心领神会，也想找个向中国挑衅的借口。

这年秋天，广州水师搜查了停在黄埔港的中国船只“亚罗”号。“亚罗”号是中国人肖成贩卖私盐的走私商船。肖成为了便于向香港当局领通航证，雇佣了一个爱尔兰人当船长。水手全是中国人，其中有曾作过海盗的李明太和梁建富等。广州水师发现这个情况，把李明太、梁建富和嫌疑犯共十二人逮了起来，押在水师巡逻艇上。这本来是中国的内政，和英国毫无关系。可是英国领事巴夏礼为了挑起事端，听说后连忙来到巡逻艇，显出生气的样子，要求水师军官梁定国释放李明太等人。梁定国说：“我们中国巡逻艇逮捕中国匪徒，你有什么权力强令释放？”巴夏礼蛮不讲理地说：“‘亚罗’号在香港登记过，领过通航证，挂过英国国旗，就是英国船。中国人没有上船捕人的权力。”梁定国说：“船是中国人肖成的，你们给的通航证也早已过期，怎么是英国船呢？”巴夏礼说：“你这样做，就是破坏条约。你不听我的话放人，是对我本人的侮辱。”还无中生有地造谣说：“船上悬挂的英国国旗被你们扯下，就是对大英帝国的侮辱。我们不能容忍！”说完，扭头走了。

接着，巴夏礼向两广总督叶名琛提出最后通牒说：“你必须立即释放被捕的人，并且要书面道歉。二十四小时内不答复，英国海军就要攻打广州。”叶名琛怕得罪英国人，下令把九名中国水手送交给巴夏礼。成心找碴的巴夏礼拒绝接受叶名琛送来的信和人，硬要他把十二个人全部“送回”，叶名琛吓得赶紧派人送了去。巴夏礼又说所派的人官职太小，对英国不礼貌，还是拒绝接受。这年九月二十五日（公历10月23日），英国海军就以这件小事为借口进攻广州沿江炮台，正式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战争一开始，叶名琛就不战而逃，英军攻入了广州城，烧毁了总督衙门。后来由于广州人民奋勇抵抗，烧毁了英军盘踞的洋楼，英军才被迫退到虎门。在美国和俄国的支持下，他们又联合法国侵略军摆好了再次进攻广州的架势。叶名琛以为侵略者是虚张声势，丝毫不作抵抗的准备。他的部将提出添兵设防，准备迎敌，他还训斥说：“谁主张添兵，军饷就由谁出，不准开销！”又说：“我建了长春仙馆，供奉吕洞宾、李太白二位。我已经扶乩[j]请仙人指点过了，仙人说再过几天就平安无事了。”

“仙人”当然救不了他的命。英法联军很快就攻陷了广州城，把叶名琛俘虏后押到印度的加尔各答，他后来就死在那里。在广州烧杀抢掠一番后，

侵略军又北上到了天津大沽口外，攻陷大沽炮台，沿白河直攻到天津城下，扬言要攻打天津再进攻北京。清朝政府急忙派人去天津议和，与英、法、俄、美分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在这些条约中，除了赔款以外，清朝政府还答应外国公使进驻北京，增开南京、汉口、烟台、营口等十处口岸，允许外国人到中国内地通商、传教等等。根据这些条约，外国人在中国的权益明显地扩大了。

《天津条约》是又一个不平等条约，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咸丰皇帝（道光皇帝已死）和一些清朝官员也感到受了“委屈”，便试探着向侵略者要求修改条约。英法政府连这些内容也不满足，怎么会答应呢？他们决定再次使用武力，逼迫清朝政府进一步退让。

咸丰九年五月（公元1859年6月），英法侵略者以护送代表去北京交换条约为名，派军舰运载着两千名军队来到大沽口。清政府指定他们从北塘登陆，随行人员不要超过二十人，经天津到北京。英、法侵略者决定陈兵北京城下，勒索更多的利益，倚仗武力，蛮横地冲进大沽口，轰击大沽炮台。守卫炮台的爱国将士忍无可忍，被迫回击，打沉敌舰十艘，打死打伤侵略军四百七十多人，英军舰队长司令贺布也受了重伤。英法联军遭到惨败，退出了大沽口。

第二年夏天，英法两国调集了两万多人再次攻占大沽，又占领了天津，向北京东边的通州推进。清朝政府惊慌失措。住在西郊圆明园的咸丰皇帝带着皇后、贵妃和大批官员仓皇逃到承德去了，留下他的弟弟恭亲王奕訢[x n]在北京与英法侵略者谈判。

英法联军到北京后，以为咸丰皇帝还住在圆明园，便绕过北京城的安定门和德胜门，占领海淀地区，向圆明园进兵。

圆明园位于海淀以北二里的地方，包括圆明、万春、长春三园，康熙年间开始修建，雍正时进行了扩建。乾隆皇帝尤其爱好山水和游玩，他到江南去过六次，看到奇峰异石，就命人搬运到圆明园内。搬运不了的东西，就叫能工巧匠在圆明园仿造。乾隆以后，清朝历代皇帝仍然不断下令对圆明园进行修饰和扩建，园内的风景日新月异，越来越美，形成一个周长二十华里，占地五千多亩，四周有澄怀园（今东北义园）、蔚秀园、承泽园、朗润园、勺园（现在都为北京大学校舍）、近春园、熙春园（现为清华大学）、一亩园、自得园（现为中共中央党校）、清漪园（即颐和园）、静明园（即玉泉山）环绕的巨大的园林建筑群杰作。

圆明园内有弯弯曲曲的流水，高高低低的假山，湖如明镜，山似迭翠。临湖靠山的地方建筑了一百多处风格各异的景致。圆明园内宫殿的建筑，吸取了历代宫殿的优点，又有很多新的创造，美妙奇特，变化无穷，更新迭异，不拘常套。此外，还有别具一格的“西洋楼”。西洋楼的构图设计和监造者是意大利著名画家郎世宁和法国蒋友仁、王致诚等人，他们受乾隆皇帝的委派，在修建时把中外建筑艺术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协调美丽，妙趣横生。至于园内那无数名贵的奇花异木，数不清的珠宝玉器，就更不用提了。无论建筑的优美，还是五光十色的金珠宝物的珍贵，圆明园都是当时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英法侵略军闯进圆明园，看见这么多的珍贵文物和金银珠宝，就象饿狼见到了肥肉，疯狂抢夺起来，能拿走的尽量拿走。每个人的腰里都鼓鼓囊囊的，肩上扛的、手里拿的全是珠宝玉器。不少人衣袋装不下，手里拿不了，

就用抢来的绸缎和刺绣品作包袱，背走成包的珍贵文物和金银珠宝。对拿不走的楠木器具、铜器、瓷器等物品，则用枪托或棍棒砸碎。

一连几天，侵略军把圆明园可抢掠的东西抢劫一空。英国公使额尔金又发表声明说：“圆明园是中国皇帝最喜爱的行宫，为了给中国皇帝极大的震动，警告他一下，使他今后不敢再在我们面前妄自尊大，应当把他的这个老窝烧毁。”英国陆军司令格兰特支持额尔金的声明，说：“为了给中国政府留下深刻印象，知道我们的厉害，有必要烧毁圆明园。”他们命令米启尔骑兵团到圆明园分头同时放火。

霎时间，圆明园内各处同时起火了。火焰升起，浓烟滚滚，遮天蔽日。庄严华贵的宫殿和优美玲珑的亭台楼阁被火光烟雾吞没，在烈焰中劈劈啪啪响了一阵后，一座座都倒塌下去。园内的奇花异木也都被践踏焚毁。整个圆明园变成一堆堆的焦土和残砖破瓦。世界上最辉煌壮丽的建筑群从此消失了。

侵略者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接着又抢劫和烧毁了畅春园和海淀镇，把圆明园的附属园苑万寿山的大报恩延寿寺（今颐和园）、静明园（今玉泉山）的十六景、静宜园（香山）的二十八景八十一间铜殿，也洗劫一空，然后放火烧毁，使美丽无比的园苑变成废墟，使世界文明遭到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英法联军烧毁圆明园以后，又在地坛一带修筑工事和炮台，作出攻打北京城的姿态。清朝政府被侵略者吓坏了，立即下令把安定门打开，让英法联军进城。英法联军一进城，就把守住安定门，把大炮设在城楼上。他们向留守北京的恭亲王奕訢发出最后通牒，声称如果不接受他们提出的全部条件，就要象火烧圆明园一样烧毁北京城内的皇宫。俄国公使伊格那提业夫也出面帮助英法侵略者说话，逼迫清政府投降。奕訢在英、法两国武力的恫吓和俄国的诱逼下，接受了侵略者提出的全部条件，分别与英、法两国签订了更加屈辱的《北京条约》。

《北京条约》除了承认《天津条约》完全有效以外，还增加了开放北京的门户、华北最大的海港天津为通商口岸，割让九龙给英国等内容。至于赔款等项自然也少不了。英法联军心满意足地退出了北京。

英法联军退出北京后，俄国也趁火打劫，派公使伊格那提业夫说他“调停”“说合”有功，逼迫奕訢与他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规定把乌苏里江以东四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给俄国。美国因为国内南北战争正打得激烈，没有和中国签订新的条约，但是由于享受最惠国待遇，别国在中国所获得的权益他们都可以“利益均沾”，也是侵略战争的受益者。

毛泽东主席曾经指出：“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毛泽东选集》第二卷591页）。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丧失了更多的主权，半殖民地化加深了。外国侵略者不仅霸占了中国大片的领土，而且大大加强了对清朝政府的控制，直接干涉中国政治，扩大了“租界”，掌握了中国海关的外国税务司，在经济上也逐步控制了清朝政府。清朝政府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也进一步投靠外国侵略者，使中国变成西方列强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让他们放手用鸦片毒害和掠夺中国人民。中国人民遭受的灾难更加深重了。同时，人民争取民主和民族独立的斗争，也广泛地开展起来，掀起了一个又一个高潮。

